



2018年第5期（总66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录

■ 新闻动态

北大师生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4
百廿星辰 巍巍北大——写在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之际	8
新时代新格局新理念——北京大学继续教育 2018 新春论坛成功举办开幕式	15
【金牌之路】赛场上的绝地求生——访第 42 届 ACM 大赛北大队队长吉如一	21
北大图书馆举办“李大钊出任图书馆主任 100 周年纪念展”	23
百廿稚子画 浓浓北大情——“我给北大过生日”小小北大人书画展开幕	25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扬帆起航	27
【共襄百廿】李彦宏校友捐赠支持北大人工智能领域的跨学科发展	31
重大喜讯！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获批	34
陆扬主讲才斋讲堂第 155 讲：历史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意义	36

■ 网教之声

慕课走向网络公开秀——评史蒂芬·道恩斯关于慕课的新观点	39
-----------------------------	----

■ 北大人物

【百廿英才】历史地理学的巨擘——记城环学院侯仁之院士	44
【百廿英才】儒雅学者 真醇人生——记北大中文系袁行霈教授	64



■ 学者谈读书

书趣|袁行霈 ----- 75

书缘|侯仁之 ----- 77

■ 好文共赏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 81

■ 史苑钩沉

校长蒋梦麟：带领北大走出艰难（下） ----- 88

■ 大美北大

百廿校庆壁纸 ----- 95

■ 学员心声

感恩母校汇总 ----- 99

编辑寄语

5月2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北大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本期新闻栏目予以详细报道。

5月4日上午，北京大学在邱德拔体育馆召开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各级领导、国内外嘉宾、长期关心支持北大的社会各界代表、国内外高校代表、海内外校友代表和在校师生隆重集会，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北京大学校内各院系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欢迎校友回家，共同庆祝北京大学120岁生日。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章政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张丽、吴晓风

编委会成员：王姗姗、曾玉芬、唐海峰、郑鹏、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蓬蓬、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李文文

■ 新闻动态

北大师生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2日，距离北京大学校庆、五四青年节还有2天。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北大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党委书记郝平：

在五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校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对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的亲切关怀，令全校师生倍受鼓舞、倍感振奋。

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北大的发展，2007年以来，他先后六次莅临北大，两次给北大师生回信。2014年5月4日，总书记在北大考察时，提出了“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等重要思想，为办学指明了前进方向，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5月2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本任务，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对高校做好立德树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广大青年成长成才提出了“爱国、立志、求真、力行”的期望。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阐明了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奋斗方向与发展路径，针对性、指导性很强。

北大师生在欢送总书记时再次喊响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体现出青年对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高度认同和坚决拥护，这是新时代青年的心声，是凝心聚力的中国好声音。

北京大学党委第一时间召开了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和师生代表座谈会，将深入开展学习宣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系列活动，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给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同学，家喻户晓、入



脑入心，切实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办学工作的指导思想，努力贯彻落实到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

校长林建华：

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提供最好的教育，使教育真正成为师生共同的探索之旅，培养造就新时代爱国、立志、求真、力行的奋斗者和实干家。

必须抓住国家发展机遇，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兼收并蓄、守正创新、引领未来，聚焦学术发展的最前沿，建立中国视角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建立符合国情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不断产出新知识、新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为国家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吴虹：

我们在培养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未来我们将进一步帮助学生把自己的兴趣和国家发展的目标达成一致。

总书记讲创新是第一动力，北大要引领中国的创新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生科院今后也将尝试组建科研团队，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法学院党委书记潘剑锋：

在我看来，北大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还有兼容并包的精神，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第二，我们的学生是很优秀的，而通过我们的培养，我们的毕业生还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三，北大的老师是一流的老师，我们要服务好一线的老师，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张平文：

要坚持正确的判断方向，坚持四个自信，这是根本；解决了自信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北大有开放的传统，真理越辩越明。

内涵式发展是北大发展的必经之路。除了本科生教育，北大的另一大成就，就是北大的交叉学科建设。今后要进一步提高发展的质量，要做减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



我们的高等教育就是在培养发挥人的本质力量的初心上下功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我们的思政教育重要的就是让同学们认识到世界大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孙熙国：

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培养什么的人才，办什么样的大学，给出一个明确答案，就是我们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最鲜亮的底色，没有人不尊重它，没有人忽视它。

总书记讲以德立身，以德立学，我认为这个德是大德，就是物质世界的规律。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董志勇：

作为北大的老师，得天下英才教之育之，既是荣耀，也是责任。一流的学生如何让他们成为一流的毕业生，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希望学生带着独立、求新、质疑精神来到北大学习，全方面地培养自己的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成

为情商优秀、智商超群、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北大人。

历史学系党委书记徐健：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自己的价值体系，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目前我们的研究和教育往往是碎片化和工具性、乃至功利性的；做的问题越来越微观，反而丢弃了本质的整体的东西。而未来我们应该强调在对比开放的教育中，增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校团委书记陈永利：

我们会把总书记对大家的祝福、希望和嘱托，特别是安全提醒，及时地传达给正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山鹰社的学生、老师和校友，让大家在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冲向我们世界的最高峰、精神的最高峰，冲向我们未来的最高峰。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本科生宋玺：

今天上午的座谈会，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当郝平书记介绍我们北大的很多毕业生毕业选择去新疆、西藏工作时，总书记特别问了一句：他们是真的沉到基层去了吗？之前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时，我记得习总书记年轻时初到梁家河时，也有一



段不适应的岁月。可与当地的群众接触以后，他意识到，扎根在这里，为这里的群众服务也是一种人生追求。

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晓丹：

总书记今天说青年是追梦人和圆梦人，不仅给我们鼓励，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发展的道路，那就是我们要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人。总书记今天还问到我们的同学是否扎根西部，让我更加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走走听听看看，而更重要的是真正知道民间的疾苦和需求，并为此而奋斗。我们这一代人将经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既是一种荣誉，也是极大的鞭策。在未来，我们要以更大的奉献精神，努力成为实干家，在新时代干出一番事业来。

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第二十六届全国学联主席王圣博：

习总书记谈到具体问题时的举重若轻是与他从政四十年的经验体会、与他的家国情怀分不开的。这启迪了我，我在想，在民族复兴的大业里我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邹瑞阳：

2014年总书记的五四讲话对我的影响很大，真的化为内心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自己发展的方向；今天再次听到总书记的讲话，觉得非常感慨、非常让人振奋。总书记引领着开放的新时代，给我们搭好了舞台，但未来却需要我们这代青年人自己站出来，所以我也愈发地强烈地感受到，国家的事情确实应该是自己的事情。

编辑：白杨

来源：北大新闻



百廿星辰 巍巍北大——写在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之际

1898 年 6 月 11 日，一份诏书留下百日维新的历史叹息，而它留给历史的，还有终结开科取士、开启现代教育的惊天之举。仿佛树起一座灯塔，它点亮了多少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期许与信念。而这部在风雨飘摇中起笔的“史书”，也注定了日后的万千气象、波澜壮阔。

这一天，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明确当年 7 月 3 日“诏立京师大学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革黜科举，代之以现代综合性教育——建立新型大学的理想就这样萌发了。

这一年的 12 月 17 日上午，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乘坐八抬大轿来到京师大学堂——北京景山东街马神庙路北的公主府。公主府外，爆竹阵阵，锣鼓喧天，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由此诞生。

这一年，中华民族危机四伏，政治风向波诡云谲。救亡图存，维新百日，终告失败。但或许是命运使然，抑或是

“以萌芽早，得不废”，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

她同时保留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火种。

120 年，此后整整 120 年，这里，成为与国运、与民族交织最紧密的阵地。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这里是推动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先锋，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中流砥柱；无数灿若星辰的名字在民族进步与复兴的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蒋梦麟、汤用彤、傅斯年、马寅初、冯友兰、沈从文、王力、吴组缃、朱光潜、宗白华、邓稼先、钱三强、黄昆、王选、宿白、屠呦呦……这里，涌现了一批批引领中国社会风气之先的人物，更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各领域的开创者、奠基人。

从来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今天，这个在历史转折的节点上诞生，浓缩了中国近代以来全部的忧患、苦难与追求，又时刻为民族复兴大业振臂高呼的殿堂，走过了两个甲子。她，依然卓



尔不群，清新夺目；她，依然海纳百川，挺立潮头……

百廿载悠长学府，双甲子薪火相传，她，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

“北大总都是站在最前列”

跨越三个世纪，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北京大学就被赋予了深重的历史使命感。爱国，与国家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成为北大永恒的精神底色。

1912年，千年帝制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土崩瓦解，中华民国应运而生。那一年的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严复出任北大首任校长。在短短8个月的校长生涯中，严复将北大教学推向正轨，英国教育学会承认北大学生的学历与成绩，成功接轨现代意义的大学。

120年，一代代北大师生以行动挥洒爱国情怀、报国之志，在国家历史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冲在最前方的，永远有北大人 的身影。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8年，鲁迅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北大学生创办《心潮》

《国民》……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9年5月3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大会上，法科学生谢绍敏义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4日，以北大为主力的各校学生3000多人到天安门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当天，被抓走的32名学生中，北大占20人……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北大教授李大钊在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组织指导“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社团……中共一大前，在全国8个地区建立的党组织中，有6个地区的党组织负责人是北大师生和校友，全国53名党员中，北大师生和校友21人，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有北大师生和校友5人。北大，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祥地，共和国先驱从这里迈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

巍巍上庠，国运所系。从沙滩红楼到未名湖畔，从北京大学到西南联大，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北大师生“眼底



未名水，胸中黄河月”的家国情怀生生不息。

因为爱国，1945年初，日夜期盼抗战胜利的马裕藻在病榻上还喃喃自语：

“天快亮了，天快亮了。”

因为爱国，82岁的诗人冯至写下《独白与对话》十首诗，在以“我和祖国”为题的三篇中，“祖国，我爱你”

“只有一句话——我离不开你”……朴素的情感，溢满书卷。

马寅初提出“牺牲主义”、北大师生真情呼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小平您好”……时代使命，被一代代北大学子赋予了鲜活的内涵。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大，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寄语莘莘学子，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时代标杆，国之栋梁，北大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林巧稚一生献身医疗事业，被誉为“万婴之母”；全国模范教师孟二冬赴疆支教呕心沥血，49岁倒在三尺讲台，感动中国；24岁的北大学生宋玺尚未毕业，即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批赴亚丁湾护航编队里唯一一名女陆战队员……

新时代，北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了“党委教师工作部”，党建引领，常抓不懈；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高起点、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与科学体系，不断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

……

季羨林说，所有的抨击邪恶、伸张正义的大举动，北大总都是站在最前列，发出第一声反抗的狮子吼。北大教授袁行霈说，更能代表北大的，乃是120年凝聚起来的精神，即心系国家、愿以自己一生换来民族的繁荣昌盛。

“繁荣学术、追求真理”

“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挥动于百年前的两面旗帜，成为无数热血青年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利器。北大教授谢冕曾经说，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

时代演进，世事更迭，但北大师生高举科学大旗的情怀未曾改变，他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从未止步。2017年11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在学校第



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北大必须把繁荣学术、追求真理作为根本追求。”

这里，涌现了一代代为真理而生的人。李大钊为他所坚定的主义慷慨就义；马寅初“单枪匹马”坚持“新人口论”风采永存；“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守护宝窟五十余载，青丝换成了白发……

这里，催生了众多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成果。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肖蔚云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和实践，王铁崖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这里，创造了数不胜数冲在世界前沿的科研硕果。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的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在1965年通过国家鉴定委员会鉴定，题为《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的文章署名21人，其中北大7人。2015年，北大校友屠呦呦因在疟疾治疗研究中的突出贡献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这里，产生了一大批改变中国的创新创造。“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之父”王选，在大多数人对中国的系统能超过外

国产品，淘汰铅字的历史变革能由中国人独立完成的质疑中，深耕激光照排系统领域18年，终让出版印刷“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世界首例经MALBAC基因组扩增高通量测序进行单基因遗传病筛查的试管婴儿，在北大第三医院诞生。

一份份耀眼的成绩单，就是流淌在北大血脉中的“繁荣学术、追求真理”的真实写照。

——1999年，23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郭永怀、钱三强、彭桓武、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于敏、周光召，北大校友有12位。

——目前，全国共有29位杰出科技工作者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其中，吴文俊、王选、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王忠诚、徐光宪、谢家麟、于敏、屠呦呦11位为北大校友，居中国高校之首。

——目前，北大共有中国科学院院士76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9人。还有25位教师获得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多位教师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法



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院士等国家相关科学院院士荣誉。

——2017年，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中，北大有41个学科入选，位居全国高校榜首。

——2017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显示，北大被评为A+的一级学科数量为21个，评为A类的一级学科达到学校一级学科总数的70%，均领跑全国高校。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1916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迎来了一位新校长——蔡元培。他带来的，不仅是焕然一新的校风，不仅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一大批良师益友，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北大传承至今的精神特质——“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兼容并包”是北大最值得一提的性格特征。“北大的‘兼容并包’在鼓励各种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其‘有容乃大’的性格。这一点是最难能可贵的，也完全可以看成是中国大学所应该追求的基本品格。”

北大之大，在于广阔胸襟、高远器识、宏远气度。北大之大，在于学术的

不懈求真、学人的海纳百川，学理的兼容并蓄……

这一切，要从蔡元培入主北大后推行的一系列举措说起。当时，蔡元培改革旧制、扶植社团、延聘名师，不但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一批新派人物，对确有真才实学的旧派人物，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也予以聘任。当然，他也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范围限定在“与政治无涉”的学术领域。正如当时北大学生所说，蔡先生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但决不允许刘提倡帝制，请辜鸿铭讲英国文学但决不允许辜提倡复辟、反对共和。

正因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五四运动因此有了策源之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了根……

北大校长林建华说：“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建的西南联大云集四方名师，他们有着不同的风格、气象，形成了众多学术流派，这也是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承与体现。”

其实，相比其他众多高校，北大的显著特点体现在“无”上：无校歌，无校训，无校旗。“三无”，不代表北大



没有文化、没有精神，而这恰恰体现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特质。

它体现在北大的一草一物、一人一事上。

比如教师。2007年，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回到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魏文胜曾遭遇科研的低谷期，但学院领导只支持、“不过问”。正是在这种其他学校少见的“放养”，给了研究者充分的学术自由，也成就了他科研的成功转型。

比如学生。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卖猪肉，并且与校友陈生联合创业，在全国开了1000多家店，真的把猪肉卖出了“北大水平”。

甚至在北大，保安也卓尔不群。甘相伟、张国强等北大保安在燕园文化的浸润下，成功考上大学。甘相伟更将自身经历著书《站着上北大》，成为一时美谈。北大法学院教授白建军记得一个细节：“一天我去农园吃饭，路边俩执勤的保安在聊天。一个说，‘你那论文怎么样了？’另一个说，‘嗯，资料收集得差不多了，正在构思。’”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和精神，让每一位北大人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有了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机会。

“北大是常为新的”

“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强调。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北大自诞生起，就有着自己的方向。在不同时期，北大会有不同的传统被挖掘、激发出来，但“敢为天下先”的胆魄，勇于突破创新的自信与信念始终如一。

鲁迅在《我观北大》一文中写道，“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但开风气不为师。”

突破、创新，再突破、再创新……北大一次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先锋和示范。

1918年，北大校役夜班正式开办。为全校工友办夜校，开创了中国高校之先例；



1919年，北大首先将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以利于因材施教。3年后，全国其他大学陆续开始采用；

1920年，春天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男女生同校之先河；

.....

1988年，北大首先提出“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拉开了北大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大幕；

1994年，北大在全国率先提出把北大建设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

1998年，助推中国大学迈向世界一流的“985工程”在北大百年校庆之时启动，中国高等教育走进跨步前行的时代；

2014年，北京大学9院系试行“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3年后，该模式推至北京大学所有院系。

2017年底，北大公布《北京大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提出到2035年，北大居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到本世纪中叶，北大将立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

今年3月，中国高等学府第一次以独资经营、独立管理形式走出国门开办

的实体办学机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启幕。

“在北大新的发展历史节点上，沿着旧地图绝对是找不到新大陆的，必须自己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林建华语意坚定，“求新”依然是不变的核心。

在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加快“双一流”建设的今天，北大提出“守正创新，引领未来”的使命，今天的“新”超越过往，赋予更新的内涵。

北大，意味着什么？

李大钊说，“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谢冕说：“这小小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南方科大校长陈十一说，“北大，我的精神源泉，我永远的学堂”。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说，北大一直是我的心灵家园。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说，“在燕园，做片红叶也幸福”。

陈平原说，“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北大，恰如此。（文/光明日报记者 晋浩天）

原文链接：[百廿星辰 巍巍北大——写在
在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之际](#) 来源：

北大新闻网，转载自光明日报网站

新时代 新格局 新理念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 2018 新春论坛 成功举办

在北京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周年校庆之际，北京大学继续教育事业也迎来了一百周年庆典。在国家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时期，北京大学以百年庆典为契机，于 4 月 10 日隆重举办“新时代改革深度发展与学习大国建设——北京大学继续教育 2018 新春论坛”。



论坛现场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纪委委员、政协

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巡视员葛维威，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前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等出席论坛。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地（市、州）委组织部相关人员、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工作负责同志、知名培训机构、各大商会、各地工商联负责同志、北大优秀学员代表等 400 余人参加论坛。论坛由北京大学主办，继续教育部和继续教育学院承办，马克思主义学院、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考古文博学院、外国语学院、艺术学院、教育学院、经济学院、深圳研究生院、信息管理系、医学继续教育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工学院、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新闻与传

播学院、科技开发部等院系和部门共同协办。

开幕式

开幕式前,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纪委委员、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进行了会面。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

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致欢迎辞,代表北京大学向各位领导来宾莅临北大表示热烈的欢迎。刘玉村在致辞中指出,100年前,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开办“平民夜校”“校役夜班”,并成立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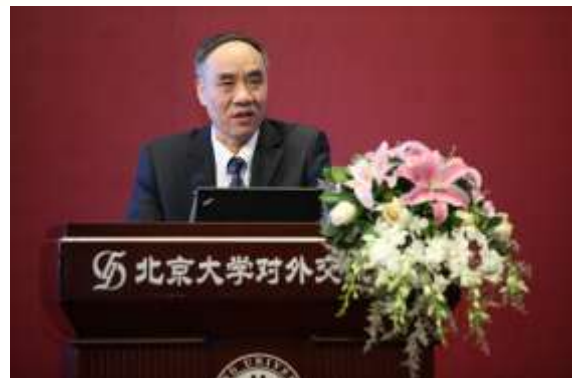
研究会,开创了北大继续教育工作的先河。毛泽东、茅盾、沈从文、瞿秋白等是新闻学研究班的结业学生。100年来,北大继续教育为社会培养了数百万计的各类急需专业人才。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是北京大学的初心,是北京大学的庄严使命,也是北大继续教育的初心和使命。刘玉村强调,北京大学继续教育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特别是要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提供直接和有力的支撑。同时,要与学校“双一流”建设紧密结合,将终身学习与立德树人作为贯穿学校纵向和横向人才培养的两条主线,为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更多更大贡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纪委

委员、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纪委委员、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中美贸易摩擦关键时刻”为题的特别演讲。他分析了当前受到全球高度关注的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和中国的表现，并指出，我们希望与美国特朗普对话，事态的发展不在我国。中国在维护着全球化、维护着多边体系，这场贸易战的实质是单边对多边、保护主义对全球化、单边的一个国家的利益对抗 WTO 国际的利益。我们要共同把全球治理做好。他强调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要明确：我们针对的是特朗普政府，不是美国人民；中国有足够的力量应对；但我们不希望把它变成金融战、高科技战、其他政治或军事上的冲突。他指出，今天博鳌论坛上，习主席以更高水平回应了特朗普。魏建国认为我们将在 WTO 里建立统一战线，老百姓、企业家都会支持政府，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打得一拳开，不怕百拳来。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
经济学家辜胜阻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创新创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的特别演讲。辜胜阻指出，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基石，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把握“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和改革引领”三大关键词，明确创新驱动供给侧、供给结构优化和改革引领制度供给三大任务，通过改革引领制度供给，调动企业家、科研人员和官员“三个关键少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新驱动供给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任务，“双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伟大实践。创新创业有助于创造新供给、激活新需求、助力产业迈向中高端与优化制度供给。辜胜阻强调，当前要积极打造

融合、协同、共享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促进创新创业上水平，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如何打造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他提出，应发挥大学及科研院所所在创新源头中的作用，深化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推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构建创业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完善“天使投资—VC—PE”创业股权投资链；构建良好的新型政商关系，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培育“鼓励冒险、包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和加强支持创新创业制度建设。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部长、数学科学学院
教授刘力平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部长、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刘力平主持。

论坛设置主论坛和四个分论坛，20余位相关领域和行业的著名专家学者从教育、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深入研讨了新时代改革深度发展与学习大国建设的新格局、新理念和新目标。



北京大学在线教育项目

“数字北大”启动仪式

开幕仪式上，举行了北京大学在线教育项目“数字北大”启动仪式。

主论坛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巡视员
葛维威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巡视员葛维威首先发表了《办好中国特色继续教育 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十九大报告强调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明确了新时代继续教育的方向。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包括继续教育在内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增强办好继续教育的责任感紧迫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继续教育。办好继续教育，要有相当的规模数量、合理的结构布局和更高的质量效益，最大程度上满足“人人、处处、时时”学习的需要。他强调，办好继续教育，必须坚持育人

为本、立德树人，坚持规范办学、质量第一，努力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充分利用网络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更好地满足老百姓对优质资源的期待。他指出，一流大学要办一流继续教育，希望北京大学继续教育能够继承百年优良传统，更好发挥国内一流高校的示范引领作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发表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主旨演讲。他首先从十九大报告中对金融改革的定位、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目标要求入手，对中国资本市场现状进行分析，并重点对资本市场进一步改革与创新，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出了7点意见。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资本市场进入新阶段。

中国资本市场在未来五年,会更加市场化,规范化,更加成熟,投资者也会更加成熟。中国将逐渐从一个投机市场变成一个价值投资市场,我们对未来五年甚至更多年的中国资本市场是看好的、是有信心的。



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前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

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前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发表了《房地产市场走势和供给侧改革》的主旨演讲。他分析了近年来楼市调控和市场走势。他认为,经济有规律,楼市有周期。楼市此起彼伏,呈现“舞龙式”发展态势。楼市调控,分城施策,城市政府负主体责任。有得有失,客观

评估。关键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2018年走势总体下行是主基调,房价平稳是大概念。他还分析了房地产供给侧改革的现状,认为改革目标明确,任重道远,他提出确立“两多一并”的住房制度,建立“1+3”的长效机制的意见。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经济学院教授章政

主论坛由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经济学院教授章政主持。

来源: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主页

编辑:山石

来源:北大新闻网

【金牌之路】赛场上的绝地求生——访第 42 届 ACM 大赛北大 大队队长吉如一

编者按：2018 年 4 月 19 日，被誉为“计算机程序设计领域奥林匹克”的第 42 届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在北大圆满落幕。共有 140 支队伍参加总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北大代表队获金牌全球第三的骄人成绩，位居亚洲第一。北大代表队的 3 位队员为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6 级本科生吉如一、17 级本科生洪华敦和数学科学学院 17 级本科生丁力煌，教练为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特聘研究员罗国杰。新闻网特开辟《金牌之路》专栏，通过专访 3 位队员和教练，专访该赛事承办方，展现北大人 ACM-ICPC 的总决赛舞台上团结协作、创新拼搏的风采，也带来第 42 届 ACM-ICPC 总决赛台前幕后的故事。

2018 年 4 月 19 日上午，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场，第 42 届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现场。

距离大赛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

观众们一直在加油打气，吉如一和队友们继续专心写着他们的代码。

吉如一，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2016 级本科生，同时也是北大参赛

队伍的队长，今年是他第二次参加 ACM 大赛总决赛。



吉如一

从去年 9 月份开始，他就开始为 ACM 做准备。从国内的区域赛到中国区的总决赛，从 2018 年 2 月份开始，他们每天都要进行一场模拟赛，每次五个小时，50 多天，他与他的队员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高中的时候，吉如一还有时间消遣，看看动漫打打游戏，吐槽《海贼王》



万年不完结。上了大学之后，他一直忙着专心搞 ACM，每天在机房——教室——宿舍三点一线来来回回，睡醒去上课，下午去训练，晚上回宿舍，洗漱过后看一两个视频解压，睡觉，第二天醒来再去机房训练。参加完第一年的 ACM 总决赛，还要带第二年。近乎单调，看似乏味，吉如一却乐在其中。

他是队长，除了训练之外还要帮另外两个小伙伴制定训练计划、督促他们训练，同时还要经常登录国外一些论坛查看训练营报名信息。国外的大学经常会举办一些训练营，这种训练营除了可以锻炼提高参赛者的能力以外，还可以让队员们对其他大学参赛队伍实力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吉如一他们之前便是在俄罗斯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训练，还认识了很多其他学校的小伙伴。

时间所剩不多，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吉如一跟队员们商量过后，决定搏一把，开始同时解两道题。

时间过得飞快，最初的解题思路很快被写好提交。

“Wrong answer!”

“Wrong answer!”

提交两次，系统均显示答案错误。冰冷无情，但是却客观公正。系统是不

会出错的，所以吉如一需要好好想一想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错。

他看向桌面。

桌子上摆着两只黄白相间的狗狗玩偶，这是三个少年之前玩抓娃娃机抓中的，有时他们会对着“狗狗”复述一遍思路，这样能帮助他们快速地发现思维漏洞，并及时改正。因为经常被揉捏解压，其中一只“狗狗”的铃铛已经掉落。现在，这两只吉祥物被带到了现场，它们被放在桌子上，憨态可掬。

通常来说，北大的学生除了课业，还会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吉如一也有。他参加了元火动漫社，“不过我太忙了，所以是‘幽灵社员’，基本不参加社团活动”。他偶尔还会与同学约着打羽毛球，被朋友们“吉利”“吉丽”地乱喊一通。

信科的学业比较繁重，基本每学期都会有一门难度极大的课程，竞赛又占据了吉如一太多时间，他周围的同学早早确定好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可他却因为一直忙于竞赛，方向迟迟没有确定下来。等比赛结束以后，吉如一还得好好补补课，保持一个较高的绩点是必须的，他还想学学英语，之后准备申请出



国交换和暑期科研。不过，这都是比赛结束以后的事情了。

此时，经过将近 5 个小时的高强度脑力计算，吉如一已经有些意识模糊。

还剩下最后十分钟。

他决定先将目前已有的代码粗略浏览一遍，没问题就直接提交。不过紧接着，问题来了，吉如一发现，自己在运算时少考虑了一种可能性，这意味着他需要临时给代码打个补丁。时间所剩无几，吉如一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清醒，匆匆忙忙写好，匆匆忙忙提交。

已经尽力了，吉如一缓慢地想着。ACM 规定每名参赛选手最多只能参加两届总决赛，参赛是再也不可能了，以后总得干点与竞赛有关的，比如指导想参加 ACM 大赛的师弟师妹们，还得多多参加课外活动，锻炼身体，不能再继续宅下去。如果这次能获得金牌就好了，

既是对自己多年竞赛生涯的一种交代，又可以为北大 120 周年校庆献上自己的贺礼。

系统在运行程序，进度条缓慢的前推。

吉如一心情紧张，甚至有些许低落，他伸手捏了捏狗狗玩偶的脸，玩偶的脸上还是治愈的笑容。

突然，“Accepted！”

“过了！！！”吉如一大喊一声，他双手握拳，脸上是说不出的激动。

绝地求生！此时距离比赛结束仅剩几十秒。（文/新闻网记者：于子悦）

相关报道：北京大学获第 42 届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金牌第三

专题链接：ACM 总决赛专题网站：

北大图书馆举办“李大钊出任图书馆主任 100 周年纪念展”

2018 年 4 月 30 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100 周年纪念展”在图书馆一

层中厅开展。本次展览旨在缅怀李大钊先生为北大图书馆、北京大学的建设与

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同时也是图书馆迎接 120 周年校庆、馆庆的重要活动。



纪念展现场

上午 8 时 30 分，举行开展仪式，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党委书记郑清文，以及部分图书馆党员和馆员参加了开展仪式。郑清文在开展仪式上致辞，他指出，2018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校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北京大学建校和图书馆建馆 120 周年，同时也是李大钊先生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100 周年。在这一特殊年份，

北大图书馆策划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开展“重温经典明使命，初心不忘北大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红色革命文献整理与学习系列活动、参观北京李大钊故居、组织观看原创音乐剧《大钊先生》、纪念李大钊专题讲座及座谈会等，以此缅怀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郑清文特别强调两点：学什么，怎么做。关于“学什么”，郑清文认为，首先要认识大钊先生的两种身份，致敬两个方面的重要贡献。1918 年 1 月，大钊先生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将北大图书馆由一个封闭式的藏书楼，转变成新型的现代图书馆，因此他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大钊先生率先在中国系统地接受、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北大图书馆是其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青年的重要基地，这值得北大图书馆每一位党员同志骄傲，也需要我们更加认真地学习大钊先生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学习、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关于“怎么做”，郑书记认为要抓住两个主体，推进两个建设，一是认真组织好李大钊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活动，希望

图书馆各支部组织党员参观此次展览，积极参与相关主题的座谈和交流，进一步加强革命文献的整理、挖掘，通过馆藏红色资源这一载体积极开展思想教育，二是不断增强馆员对校史馆史、校情馆情的认识，提升爱校荣校、爱馆荣馆的精神，鼓励引导全体馆员把对李大钊先生的敬意、爱校爱馆的热情转化为参与校庆馆庆、支持图书馆发展的实际行动，一起携手迈上北大图书馆发展史上的新征程。

开展仪式结束后，陈建龙和郑清文十分仔细地观看了展览，并不时就展览中的相关信息与大家交流意见。本次展览设计精细、文献详实，很好地展示了李大钊先生在北大图书馆主任任上和任北大任教期间的重要贡献和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展览以北大图书馆丰富的

民国文献为依托，展出了《新青年》《北大日刊》《新潮》《晨报》《觉悟》副刊、《学灯》副刊等与李大钊有关的重要原始文献，以及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期间，他本人及吴弱男、罗家伦、周泽春、阪谷芳郎男爵等人捐赠给北大图书馆的珍贵书刊，内容丰富、文献珍贵，颇值得一看。



参观纪念展合影

编辑：凌薇

来源：北大新闻网

百廿稚子画 浓浓北大情——“我给北大过生日”小小北大人书画展开幕

4月29日上午，在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北大雏鹰社“我给北大过生日”小小北大人书画作品展在北京大学新太阳学生中心大厅举行了开幕式。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工会主席孙丽，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德育主任莫辉，北京大学附属幼儿

园园长王燕华，北京大学雏鹰公益社负责人、北京大学督查室副主任田越和百余位小小北大人家庭成员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艺术学院杨玉娟老师主持。

高松为活动开幕式致辞。他表示，蔡元培校长在教育中非常注重“全面人

格”的培养，美育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雏鹰社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促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这次的活动更是美育的重要实践。希望孩子们可以“专心地学习，痛快地玩耍”，从雏鹰逐步成长为翱翔于广阔天际的雄鹰。



高松参观书画展（摄影：顾晓光）

孙丽高度赞扬了书画展的作品，表达了对于北大附小和幼儿园、雏鹰社的各位老师、参与本次活动的孩子们和家长们的感谢之情。希望家长更加积极参与雏鹰社的建设，孩子们更加积极参与课外活动与自身发展。

莫辉为北大附小学生积极参与本次活动并有多幅优秀作品入选展览感到高兴与自豪。她感谢雏鹰社搭建的平台，培养孩子们对于美的感知；感谢附小多元自主开放的氛围，组建了高水平的艺术社团；感谢家长们的支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感谢可爱的孩子们，描绘出自己心中的缤纷北大。

王燕华现场清唱了改编的生日快乐歌，表达了对于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的祝福。她讲述了北大附属幼儿园一个四岁孩子画作体现的对在北大从事科研工作的妈妈的爱，赞扬了孩子们对母亲、对北大的赤子之情，祝愿孩子们快快乐乐生活，健健康康长大。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胡俊作为家长代表发言。他非常感谢各位家长为雏鹰社的活动所共同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希望营造好“家长搭台，孩子唱戏”的生态，促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书画展现场（摄影：张宁）

就读于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的姚皓程说，他们用手中的笔和心中的爱作画，虽然稚嫩，但饱含了浓浓的燕园情。三年级的杜璞写了一首小诗《夏感》为北大庆生：“夏暖闻蝉鸣，忽见白蝶飞。荷花浮水开，荷叶浮水生。千鸟树头唱，万鱼池中舞。百廿稚子画，浓浓

北大情。”五年级的童万轩表示，燕园是一个大的鸟巢，经历了120年的风风雨雨的同时，养育了一代代的雏鹰。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要心怀天下，早日成才。

田越从致敬北大、致敬雏鹰社前辈、致敬小作者三个角度介绍了活动的过程和意义。她表示，本次画展的作品将做成书画册、纪念衫、头巾等，将孩子们的艺术作品长期保存留念，以后在雏鹰社的活动作为纪念品发给大家。雏鹰社在认真地做活动为百廿北大庆生，让小朋友快乐成长，邀请更多的北大教职工志愿者参与到社团建设中来。

书画展定于4月29日-5月12日在北大新太阳学生中心展出。它展示的不仅是小小北大人的艺术才情，更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北大的热爱；它展示的不仅是对小小北大人热心创作的尊重，更是对他们开启艺术创作的启蒙。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灿烂笑容是百廿校庆活动中一抹靓丽的色彩。（文/新闻网记者 齐华瑞）

编辑：山石

来源：北大新闻网



开幕式全体人员合影（摄影：顾晓光）

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扬帆起航

2018年4月20日下午，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启动仪式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行。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40周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顺势

而为，发起成立“一带一路”书院。书院依托光华的学术机构优势，汇聚北大一流的人文社会等多学科资源，肩负起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培养政商领袖、以研究与教育贡献新型全球化的时代使命。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司长赵艾，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出席并致辞。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到会祝贺，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以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出席了本次大会。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代表学校致欢迎辞。

王博表示，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即将到来，“守正创新，引领未来”是北大坚定的选择。回首过去，北京大学在 120 年的历史中一直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而要引领未来，则要直面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北京大学率先垂范、积极行动，不断贡献学界力量。建设好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以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为相关国家培养未来政商领袖，为新型

全球化进程做出更大贡献。王博指出，该书院由光华发起成立，最主要有两大优势：第一是理念上的优势，第二是在聚集人才、资源、知识和思想方面的优势。他希望未来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等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将“一带一路”书院做好。



王博致辞

郑建邦对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表示衷心祝福，对“一带一路”书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书院的成立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尽管目前国内开展“一带一路”研究的高校和机构有不少，但相关的基础性研究仍显薄弱，人才培养方面也有所欠缺，尤其是以经济建设急需的工商管理类人才的培养步子可以迈得更快、更大一些。

在郑建邦看来，北大“一带一路”书院将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对政商人才和青年领袖的培养，进一步增强民心相通、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梳理中

国发展理念等，这是极具前瞻性眼光和战略性思维的。

“我想，未来光华要服务的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更高维度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人文交流，培养大批共建‘一带一路’急需的政商人才，推动教育深度合作、互学互鉴等。”郑建邦认为，“一带一路”书院的启动，意味着全新的起航。



郑建邦讲话

赵艾指出，五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惠及相关国家和人民。

“一带一路”建设是全新的伟大事业，需要各方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北京大学认真开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瞩目成绩。他希望，北京大学特别是“一带一路”书院能发扬北大敢为天下先的光荣传统，依托雄厚底蕴和丰

厚资源，肩负历史使命，勇担时代责任，汇聚北大力量，发挥光华优势，在新时代更好地参与、服务“一带一路”的建设。



赵艾讲话

王定华指出，长期以来，北大广大师生始终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期盼同频共振，“一带一路”书院的成立就是北大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写照。他期待书院能够发挥学术机构的独特价值，运用研究和教育等主要抓手，参与定义新一代全球化内涵，共同书写世界的美好未来，并对书院未来的发展和建设提出建议：一是开展教育互联互通合作，二是开展人才培养培训合作，三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四是凝聚社会各方智力资源，定期开展多类型专题讲座或高峰论坛。



王定华讲话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在作主题演讲时诠释了“一带一路”书院的内涵。他表示，书院是一封面向未来的邀请函。邀请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政商精英一起交流发展理念和经验，破题影响人类社会进化的重大问题，以平等和开放的胸襟一起定义全球化新时代的内涵。“2018年，我们将开始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广泛招收具有优秀学业表现，胸怀远大，具有全球视野，敢当精神和强烈使命感，同时具有卓越领导才能或具备领导潜质的中青年人才。未来2-3年，形成每年400-500名学员的培养规模。”刘俏表示，未来书院还将系统研究和梳理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商业实践案例，开展跨领域、跨国别的经济和商业研究，通过对大量有各国特色的商学案

例进行研究，反哺中国对外开放，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刘俏讲话

厉以宁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合作共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的成立，希望能够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增加新知识、新本领，以及新的事业发展机会。“一带一路”书院未来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新观念、新思路和新人才上。在经济学领域什么是“新观念”？首先是前提假设的变化。厉以宁指出，流行了200多年的经济人假设已经行不通了，著名经济学家西蒙提出的次优选择理论则启示人们，现实中的人不是经济人，而应该是社会人。再如，创新的定义。熊彼特认为，创新主要是生产要素的重组。现在的创新不仅包括生产要素的重组，还包括信息的重组，要考虑与资本的结合。过去认为年轻人没有资本

和经验，也就无法创业，但今天的年轻人跟 100 年前不一样，只要有好的创意，就能够吸引投资。此外，经济发展模式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了高质量增长，这个变化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断实现。



厉以宁讲话

在本次活动中，郑建邦、厉以宁、赵艾、王定华、王博副校、刘俏共同为“一带一路”书院上台揭牌，来自政商学各界的嘉宾们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未来书院将以思想光华推动全球更好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揭牌仪式

编辑：麦洛

来源：北大新闻网

【共襄百廿】李彦宏校友捐赠支持北大人工智能领域的跨学科发展

4月28日，李彦宏校友向北京大学捐赠仪式在教育基金会举行。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携夫人马东敏博士重返母校，宣布向北京大学捐赠6.6亿人民币(含部分等值资产)，联合成立“北大百度基金”，用于人工智能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探索，助力北京大学在迈向新百廿的进程中挑战前沿、再攀高峰。这

是目前北大百廿校庆收到的最大单笔捐赠。



签署捐赠协议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和夫人马东敏，副总裁王路，副总裁王海峰，百度创始团队成员、北大信科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联合主任雷鸣，百度总裁办公室、董事长办公室主任周达，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郝平，校长林建华，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副校长、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王博，副校长龚旗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医学部副主任肖渊，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张平文，信息管理系党委书记张久珍，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李宇宁，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总裁赵琳等共同出席。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黄如主持仪式。



林建华致辞

林建华在致辞中向李彦宏多年来对母校的感恩回报与深情厚谊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大学是通向未来的桥

梁，在 120 周年校庆的特殊节点，北大应通过反思不断超越，带领下一代走向未来。他希望，百度与北大能够一起抓住新时代的新机遇，坚持守正创新、引领未来，共同把北大建设成为一所伟大的大学，把百度建设成为伟大的企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发展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彦宏致辞

李彦宏在捐赠仪式上说：“这么多年，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走了多远，我总能从母校找到支撑自己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和现实支撑。”他表示：“这次我们向母校捐赠 6.6 亿元，寓意为北大双甲子庆生。这更是一个再次把我的理想和北大融为一体的机会。把百度的强技术、广实践与北大博大、深厚的学术研究能力连接起来，来催生出更多惠及国家和时代的成果。”

詹启敏感谢李彦宏和百度公司支持北大智能医疗领域的学科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的发展正在颠覆传统的医疗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期。“北大医学”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将推动多种前沿优势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多种前沿先进技术的落地和应用。医学部和北大各院系将和百度强强联手，在智能医疗领域取得突破和建树，大力推动健康经济整体增长，让更多的老百姓获得优质的健康服务。



郝平、林建华向李彦宏、马东敏颁授北京大学名誉校董铜牌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李彦宏、林建华共同签署捐赠协议。郝平、林建华向李彦宏、马东敏颁授北京大学名誉校董铜牌，并向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颁授北京大学杰出教育贡献奖。“李彦宏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为李彦宏校董、马东敏校董佩戴校徽。



合影

李彦宏校友于 199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多年来始终心系母校、回馈母校。2009 年，李彦宏校友在北京大学设立了第一个以“回报”命名的李彦宏回报基金，支持北大的奖学金、学生国际交流和院系发展等项目。2014 年，他再次捐资注入该基金，为北大的院系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更大支持。在北大 120 周年校庆之际，李彦宏校友捐资回报母校，这笔捐赠主要用于支持信息科学、医疗、经济学、传播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等与人工智能的交叉领域的前沿研究，这与百度在人工智能领域长期发展目标高度契合。

编辑：山石

来源：北京大学主页

重大喜讯！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获批

2018年4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议书，项目法人单位为北京大学，项目总投资17.5亿元，建筑面积72000平方米，建设周期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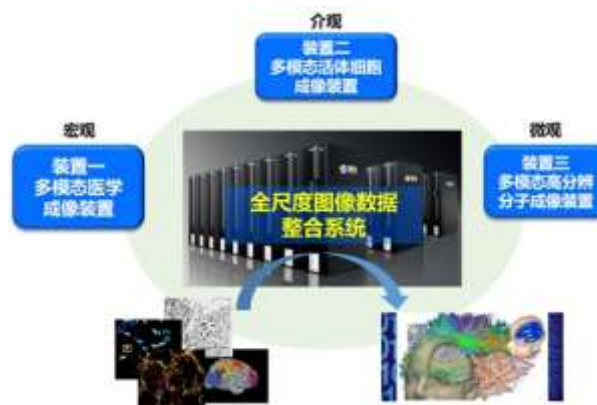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鸟瞰图

该设施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确定的10个优先建设项目之一，是生物医学成像领域由我国科学家首倡的大科学工程，将提供革命性的研究手段，对生命体结构与功能进行跨尺度可视化描绘与精确测量，进而破解生命与疾病的奥秘。



从分子到人的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示意图

设施主要建设多模态医学成像装置、多模态活体细胞成像装置、多模态高分辨分子成像装置、全尺度图像整合系统及相关辅助平台。设施建成后，将成为国际上成像模态融合程度最高、可视化解析能力最全面的全尺度成像系统。



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主要建设内容



该设施集中建设在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内容，将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集群效应，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多主体融通创新。项目建成后将按照“开放合作、资源共享”的原则，面向全世界用户开放，开展科学研究和国内外交流。

四年多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北京市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大学牵头，联合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欧洲成像中心法国居里研究所、北京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国内外优势力量，共同推动“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的申报和筹建，共有 300 多名院士专家参加了百余次项目方案设计和论证会议。

北京大学在生物医学成像模态融合、原理创新、微型化、高通量等方面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形成了基础研究、仪器研发、临床应用的全链条创新，将举全校之力，成立二级单位，由成像技术、生命、医学、临床、信息、

工程等多学科构成，承担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任务。

为充分发挥成像设施辐射带动和产学研联动效应，北京大学将在各部门支持下，联合各方力量积极探索在长三角（苏州）、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一带一路（西安）等地组建生物医学成像的科学和教育联盟、产业转化中心以及示范基地，统筹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成像技术研发、成像装备自主研制、医学影像研究与临床应用、高水平成像专业人才培养，带动我国高端医疗装备和科研仪器的自主创新发展，并适时推动成像组学国际大科学计划。

大事记：

2013 年 12 月 24 日，时任北大校长王恩哥提出并主持设计启动，第一次成像设施筹划会在北京大学顺利召开。

2014 年 5 月 22 日，成像设施规划方案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5 年 6 月 14 日，中国生物医学成像发展战略高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5 年 11 月 22 日，第一届生物医学成像新技术新方法青年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2017 年 8 月 28 日，第二届生物医学成像新技术新方法青年论坛在西安举办。



2016年7月13日，国家发改委组织“十三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项目评审会。

2016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带队赴怀柔科学城商定成像设施落地事宜。

2016年12月23日，国家发改委联合八部委发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十三五”规划》，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被列入“十三五”优先启动建设项目。

2017年3月13日，北京大学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签署合作协议。

2017年4月19日，北京大学、苏州市人民政府、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中科院苏州医工所签署成像设施苏州工程转化中心合作备忘录。

2017年4月22日，成像设施“金阶初步”香山会议顺利召开。

2017年5月9日，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签署合作备忘录；2017年6月9日，北京大学与法国国家成像中心达成合作意向。

2017年5月18日，成像设施-医学影像技术创新产业联盟筹建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

2017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向教育部报送成像设施《项目建议书》。

2017年6月10日，教育部召开成像设施《项目建议书》预审会。

2017年6月28日，北京大学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成像设施深圳基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7年8月1日，教育部、中科院向国家发改委正式报送成像设施《项目建议书》。

2017年9月29日至30日，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咨公司召开成像设施《项目建议书》评估会。

2018年2月22日，国家发改委政务服务大厅正式受理成像设施《项目建议书》。

2018年4月13日，成像设施《项目建议书》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

编辑：山石

来源：北大新闻网

陆扬主讲才斋讲堂第155讲：历史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意义

历史学是一门极为古老的学问，在过去长期承担着教化民众了解自身传

统、辨别是非的职能。历史学又是一门不断变化的学科，虽然讲述历史学在当

今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并不容易，然而对历史进行探究应该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思考方式。2018年4月19日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详细讲授了现代历史学的几个主要特征，并针对历史学在现今知识体系的地位和价值进行探讨。



陆扬主讲才斋讲堂第155讲“历史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意义”

陆扬教授首先开门见山地剖析了现代历史学的本质。他认为每一个学科都拥有学术自信，历史学也不例外。正是因为历史学有着宽广的范畴和深厚的内涵，人们对历史学的解读就有了较大的出入。举例来说，现在历史作为大众娱乐的素材被广泛使用，还有不少历史的普及读物得以出版，但这些产物与真正的历史研究是存在一定距离的。追溯根源，历史学于19世纪后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连接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也是人类思想世界的窗口。在中国，梁任公掀起史学革命，提倡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拓宽，不拘泥于帝王将相，而是要扩大视野，以史为鉴，让历史学研究指引中国的前行方向。

接着，陆扬教授指出历史学是第三者的书写，所以历史学家容易将历史时段客体化，让自身与被研究的历史产生距离，从而反观、思索重要历史节点的意义和价值。针对历史学与语言的关系，陆扬教授认为，语言的感染力直接影响到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强度，一些历史学家的文笔简洁干净，带着一丝反讽且冷峻的态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历史研究品格。在历史学界，一部分学者秉持思辨的精神，懂得对“认定”的历史产生怀疑；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历史事件并没有想象中的重要，因为事件的“烟雾”总是稍纵即逝，而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前进、变化。之后，陆扬教授又围绕“史无定法”“历史想象力”主题，点明现代历史学方法论的多样性，例如人类学 (Anthropology) 和民族志 (Ethnography) 在历史研究中的交叉和帮助。陆扬教授还强调了现代史学和国家民族兴衰的密切关系，比如外交史的

研究除了剖析国家之间利益的博弈,其本身还是国家和民族意志的体现。

最后一个部分,陆扬教授谈及史学的价值和局限性,并介绍了当下史学中“人的回归”。大体来讲,系统史学可以更好地剖析既定的历史阶段,把历史事件看作是一种糅合经济、文化因素的社会选择,而并非完全是社会发展的标志。然而,史学也有它的矛盾之处,就在于既要明了过去和他者的时空、语境与当下截然不同,还要努力做到不去简单地套用分析和思维框架来设置各种研究前提,并做出自主性分析和界定。其中,“人”作为史学的研究对象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针对不同于伟人的、受制于时代的普罗大众的人生轨迹的历史研究,可以提供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提示和警醒。

讲座收尾处,同学们纷纷向陆扬教授提问,陆教授耐心地作出了详尽、深刻的解答,他指出正史和野史作为研究对象,其所含的学术价值是平等的,然而优秀、自觉的史学家懂得筛选并使用最好的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到了历史学是一门最致力于研究具体的“人”的学科,历史学家常常会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得到学习和反思。陆扬教授谦逊温和的讲授风格广受好评,讲座在同学们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专题链接: 才斋讲堂

编辑: 山石

来源: 北大新闻网



提问环节

■ 网教之声

慕课走向网络公开秀——评史蒂芬·道恩斯关于慕课的新观点

编者按：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史蒂芬·道恩斯（Stephen Downes）在出席 2017（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时，发表了名为《在线学习与 MOOC：愿景与路径》的主题报告（详见 2017 年 12 月刊），针对业界不断质疑的“MOOC 已死”，他认为“MOOC 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个人学习，而不是个性化学习。未来，学生就是教师。”他断言，MOOC 大发展的时代远未到来。对于 Downes 这些观点，国内的专家也有话想说，本期推出中山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王竹立的观点。

MOOC 未死，但 xMOOC 式微

作为与乔治·西蒙斯（George Siemens）共同创建 MOOC 的慕课之父，史蒂芬·道恩斯认为慕课具有两大特征：一个是大规模，另一个是开放性。

这从慕课的英文名称（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网络开

放课程）也可以看得出来。但后来真正流行的是 xMOOC，这是由斯坦福大学和其他大学共同开创的 MOOC 新形式，它将 MOOC 和传统课堂的行为主义学习方法结合起来，将传统课堂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搬到网上，按照预先录制好的视频和教学计划，进行类似于学校教育的按部就班式的系统学习，因而又被称为基于行为主义的慕课，以与西蒙斯和道恩斯提出的基于关联主义的慕课（cMOOC）相区别。事实上，xMOOC 在学习内容、方法、步骤、评价等方面的开放性上已与 cMOOC 拉开了距离。

我认为，xMOOC 存在四大问题：第一，慕课制作成本较高，缺少成熟的赢利模式，难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第二，预先定制的课程内容与网络时代知识更新很快之间存在矛盾；第三，学生人数众多使得师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变得困难；第四，如何维持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也是一个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即预先定制式的教学与网络时代知识更新快之间的矛盾。结构化的课程体系与网络时代知识碎片化、学习碎片化、时间碎片化之间存在矛盾。慕课前期高标准高投入的制作模式,显然令后续的修改与完善不太方便。这使得慕课的内容过几年就显得陈旧,不再适合继续开课。

慕课的学习者大都是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成年人,这些人往往已有工作和家庭,他们的学习时间较少,学习的目的性较强,并不需要学完所有的内容,而只想学习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慕课的结构化内容和循序渐进式的课程进度,会令这些人难以适应,从而中途离开课程的学习,导致高辍学率,降低慕课的效益。

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导致xMOOC风光不再的原因。至于后来慕课的另一变种私播课(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 SPOC),则是对道恩斯们首创的MOOC大规模、开放性两大原则的进一步背叛。

个人学习是个性化学习的最高形式

史蒂芬·道恩斯认为,“未来慕课应该由个性化学习向个人学习转变。”

在谈到个人学习与个性化学习的区别时,道恩斯说到:“个人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两者的差异在于,所谓个性化学习是学习者学习已经存在的学习内容,而个人学习则是学习内容本身事先并不存在,内容是由学习者个人对它进行创造、改变;个性化学习像是学习机构为学习者做好了一切,既快速又便捷,而个人学习是学习者为了自己而做的工作,自己为自己创造学习机会。”

道恩斯所说的“个人学习”,其实就是更彻底的个性化学习。我曾给“个性化学习”下过一个定义:“所谓个性化学习,应该是根据学习者个人的兴趣、爱好、需要,由学习者选择自己想学的内容和适合自己的方式,按照个人的节奏、步骤、进度进行的学习。一句话,个性化学习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对比道恩斯的描述和我给出的定义可以看出,我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学习,与道恩斯所主张的个人学习基本上是相似的,即个性化学习不仅仅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节奏、步骤、进度和方法上有自主性,还在学习的内容上有自主性。

目前的学习可以划分为学科导向的系统学习、个人导向的系统学习和碎

片化学习三大类。我认为，学校教育以学科导向的系统学习为主，网络学习包含个人导向的系统学习和碎片化学习，网络教育介于两者之间。在学科导向的系统学习中，学习的个性化程度不高；只有在个人导向的系统学习和碎片化学习中，才能保证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个性化。

根据道恩斯关于“个人学习则是学习内容本身事先并不存在，内容是由学习者个人对它进行创造、改变”的描述，道恩斯所说的个人学习更接近于我所主张的“个人导向的系统学习”，即零存整取式学习。这种学习是指学习者从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出发，以问题为中心开展探究性学习，像蜘蛛织网一样一圈一圈的扩大探究的范围，并通过积件式写作、个性化改写和创造性重构三个紧密关联、循环往复的环节，实现化零为整、知识创新的目标，建立个性化的知识结构。

慕秀（MOOS）的理论与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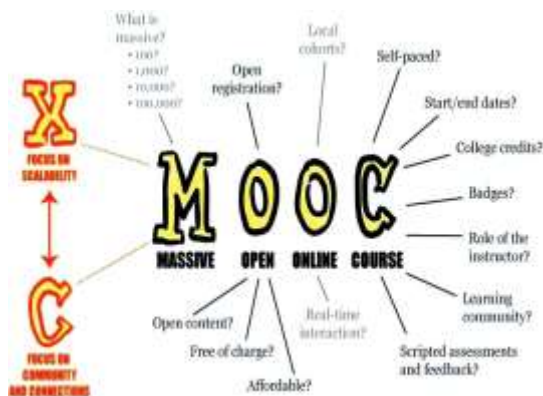
我曾提出“慕秀”的新概念，建议将慕课（MOOC）向慕秀（MOOS）转型。慕秀是大规模网络开放分享（Massive Open Online Share, MOOS）或大规模网络公开秀（Massive Open Online

Show）的英文缩写，“慕秀”就是在传统慕课的基础上，引入新建构主义教学法的分享式学习理念，让学习者在学习慕课的同时，充分分享自己的网络学习的过程与成果，互相鼓励、激发创意，推动网络学习向纵深方向持续发展，构建个性化的知识体系。

慕秀不再是一门传统意义上的课程，它有开始的时间，但没有结束的时间；在慕秀中，学习是一个不断向前流动的过程，笔者称之为“学习流”；教师无需在课程结束后对下一期学习者屏蔽以前学习者留下的练习、作业、作品、问题答案等资料，反而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记录，作为课程学习资源的一部分；学习者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也可在任何时候离开；教师在慕秀中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和知识提供者，无需事前掌握学习者分享的全部知识，而是以共同学习者身份，与众多的网络学习者一起学习，共同成长；学习的内容可以随时更新，学习的资源可由网络学习者共同提供；学习不仅仅是接受传统学科知识体系的过程，而是一个建构个人知识体系并实现知识创新的过程。

教师可在合适的阶段，根据学习者的分享成果和对学习主题所做出的贡

献,根据一定的标准,组织公开的评审,挑选出其中优秀的学习者颁发学习证书,乃至授予相应学位。



2017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共读活动》就具有了慕秀的基本特征。这次活动通过手机在线学习,完成大家一起共读一本书活动。我是领读人之一,负责领读我的《你没听过的创新思维课》一书。这本书一共分为十五讲,以课堂里师生对话的形式,介绍了创新思维的方方面面,还附有课后阅读与课后练习。每隔两天,我在学习通共读群里发布我的每讲领读内容,活动组织人则负责发布每一讲的主要阅读内容(从书中摘录的每一讲文字),并组织各种相关讨论与练习活动。加入共读群的网友通过参与各种活动。

学习内容以我的书为主线,但不限于书里的内容。除了发布每讲重点和要点介绍音频外,我还经常提供一些补充

的学习内容与材料,布置一些练习和任务;组织者也经常发布补充材料、组织话题讨论、制定与实施各种活动规则;学习者则通过参与活动和讨论、展示个人作业作品、发表读书心得等来获取大家的点赞,获得点赞最多的学习者可被评为“采蜜小能手”而获得组织者的奖励。

整个活动过程都是开放的,大家在一个时间段里共同学习同一个主题,领读人只是作为一个陪伴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学习者可以自由进出各个共读群,按照个人的兴趣和需要学习相关的内容。活动持续一个多月,最后根据每个人的表现,评出优秀学员并颁奖。

最近,我还让上《创新思维训练》课程的中山大学学生将自己或小组的创意作品上传到共读群里,由大家投票和点评。这种活动与慕秀理念非常接近,只要把读书换成看教师的慕课视频、并不断组织下去就可以了。共读可视为慕秀的一种特殊类型。

cMOOC 或慕秀何时才能大规模推广

从上文可以看出,无论是 cMOOC 还是 MOOS,都含有过于理想的成分,因而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和大规模推广。



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人类经历了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再到快速步入智能时代的急剧变化,在中国更是包含了农业时代的残余。这种多个时代特征在同一个时空里同时存在的现象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人的观念、体制机制的变革都难以跟上这样的发展速度,时代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传统学校和课堂教学模式还没有完全失去其价值和效用。这为 xMOOC, 甚至 SPOC 这种介于

新旧之间的网络教育形式留下了暂时生存的空间,而 cMOOC 和 MOOS 这类新模式还只限于少数高端学习者在使用。然而,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进步,当智能机器人取代了人类大部分的体力与智力劳动之后,培养创新性人才就成为唯一的人才培养目标,到那时,诞生于工业时代的,以统一化、标准化、集中性为特征的教育教学模式才会消亡殆尽,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学习乃至个人学习才可能大行其道。

(作者单位为中山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http://www.media.edu.cn/zyyy/wj/201802/t20180205_1584605.shtml

来源: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北大人物

【百廿英才】历史地理学的巨擘——记城环学院侯仁之院士

编者按：鸿儒荟萃，领思想之潮；群英云集，开风气之先。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120年来聚集了众多的著名学者专家、学术大师，涌现出大批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些杰出人物，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谱写了北大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值此百廿校庆之际，新闻网特推出“百廿英才”专题，和读者一起感受这些杰出人物的学识魅力、人格魅力、精神魅力。本网首先推出的是，党委宣传部于2006年采写的首届“蔡元培奖”获奖者专访。

认识侯先生是在1999年冬天的一个夜里。那晚狮子座流星雨大爆发，为寻找开阔地观看，我来到未名湖南岸，在慈济寺遗址旁，看到了一位拄杖的老人，静静地仰望星空。我们作伴观看，他说他是侯仁之。

深夜一点多了，88岁的侯先生兴致不减，为阵阵划过的流星叫好，这一幕深深地感染了我。

流星划过的间隙，侯先生指着遗址前的空地：“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的一个晚上，我们燕京大学的学生就在这里集会。”那年，侯仁之24岁。

侯先生已在燕园度过了67个春秋，无数个夜晚，无数颗流星划过。而在燕园的学术星空，侯先生更像一颗恒星。



侯仁之院士



一 胸怀天下

一个学者的成长，总是打上时代的印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侯仁之在通州潞河中学度过了最后一年。

毕业前夕，校长陈昌佑找到侯仁之，问他有什么打算。多少年后，侯仁之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对话。

“我想回我的原籍教小学。”

“为什么教小学？”

“到群众中去，到民间去，回原籍教小学，宣传抗日。”

“你父亲让你学医啊。”

“我对学医没兴趣。”

“你对什么有兴趣？”

这把侯仁之问住了，他愣了一下，说：“我在《中学生》上看到顾颉刚的文章，受到启迪，才这么决定的。”

顾颉刚的那篇文章是《敬告今日青年》，刊登在1932年1月的《中学生》杂志上。为了这篇文章，侯仁之从通县潞河中学步行到北京的开明书店，来回走了100里路，买了回去。文章说，抗日不能停留在口头，要唤醒人民群众，到群众中去。那时，侯仁之还不知道顾颉刚是谁。

听完讲述，校长说：“顾颉刚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你不如考燕京大学历史系，这样更好。”谈话完毕后，侯仁之立即写信给在天津学习的弟弟硕之，征求他的意见。弟弟回信说：“学医可以为人治病，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例如鲁迅和郭沫若就是很好的榜样。”弟弟的话让侯仁之坚定了选择。

1932年，侯仁之考取了燕京大学，学习历史专业。1937年，顾颉刚任历史系主任，侯仁之留校为研究生，兼做顾颉刚的助理。“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顾颉刚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的研究生。

在燕京大学，侯仁之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也踏上了终生从事的研究之路，更重要的是，这里给予了他心灵深处的影响。

在89岁的时候，侯仁之看到了1944年自己写给大学毕业班的留言，留言写道：

“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衣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美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



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结果，却愈发使他觉得自己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生命，这就是所谓的‘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一个青年能在三十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诸君就要离开学校了，职业也许是诸君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职业不过是求生的手段，而生活的重心却要在事业上奠立。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谈及此事，侯仁之说：“当时我之所以能写下这些话，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自己献身的事业上，既已经历了日本侵略者的严酷考验，但更重要的是，我在心灵深处接受的我的师长所给予我的亲切教导，以及明清之际的几位学者志士如徐霞客、顾炎武和陈潢给予我心灵深处的深刻影响。”

顾炎武对侯仁之的影响很大。侯仁之认为“顾炎武是一手握笔一手执剑的人”。他说，顾炎武终生都在战斗中，

为反对腐朽的晚明封建统治而战，为抵抗清兵入关而战，为捍卫自己的民族气节而战，为扫荡当时社会上虚浮颓废、脱离实际的学风而战，为追求民主和个性而战。当日军逼进北平的时候，侯仁之刚刚出版了他的硕士论文《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炎武的著作。听到日军的铁蹄声，侯仁之用他拿笔的手，抄起了剑。

日本宪兵队驻西苑，燕京大学建立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美籍教授夏仁德做主席，侯仁之做副主席。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组织把学生送到抗日根据地或大后方去。一条路线是穿过西山，直达肖克的司令部。一条路线是送学生到南方去，到成都的工业合作社，继续培养，参加抗日。

当时燕大 1939 年的毕业生陈絮去过延安，回到燕大，参与联系此事，陈絮不出头，侯仁之负责面上的工作。他们前后送出了三批，最后一批到了北方抗日大学。生活辅导委员会送出的燕大学生中，新中国成立后有人做了北京市副市长，有人做了驻联合国代表。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20 余名师



生被捕，侯仁之是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们被押往日本宪兵队总部，关押在原北大红楼的地下室。侯仁之记得，阴森森的红楼地下室，透过窗户栏杆照进来些许日光，上面不时传来日本宪兵来回的走动声。

次年2月，关押的学生被释放了，11位教师依然被扣留。他们被送往日本军事法庭，关押在东直门内炮局三条日本陆军监狱候审。6月18日，军事法庭判侯仁之徒刑一年，缓刑三年。三年没有迁居旅行的权利，随叫随到，而且必须找人作保。燕京大学校医院的院长吴继文，在东城开了个诊所。以自己的诊所做铺保，他给侯仁之作保人。

采访时，94岁的侯仁之回忆起那段往事：“我兼任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送学生参加抗日工作的事，日本人一点也不知道。从宪兵队转押到日本军事法庭的时候，有个单子，让我签字，我看见单子上我的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这八个字是能成罪名么？可笑极了。”说到这里，侯仁之开怀大笑。

取保出狱了，哪里去？燕大日军被占领，强行关闭了，侯仁之还要随时被传唤，他只有去天津了。侯仁之的岳父在天津，是个有名望的大夫。当晚，侯

仁之到了天津岳家，女仆人开门，楼上灯还没熄灭，侯仁之到了妻子张玮瑛的房间，蚊帐里面，妻子入睡了，旁边躺着刚刚出生4个月的女儿馥兴。张玮瑛忽然醒来，一把抓住了丈夫的手：“真的回来了？”

那一幕永久地刻在了侯仁之的脑海中。他回忆道：“我第一次看见了女儿，她静静地熟睡着，像乱世中漂泊的一叶小舟。”

出狱后，生活辅导委员会送学生参加抗战的事情被再次提起，情况危急，侯仁之想穿过封锁线到成都去躲避，就让张玮瑛从天津来北京征求恩师的意见，洪业说：“不能走，走了会连累保人的；再说，如果不走，即使再次被捕，甚至被判死刑，燕京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判刑的。”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让侯仁之震动，他相信恩师。洪业告诉他，拿起笔，做学问。

做学问也不得安宁，日本人来监视，经常有穿便衣的或穿西装的日本人上门来：“现在干什么啦？”态度时而凶暴，时而缓和。汉奸也来拉拢，邀他到敌伪的研究机构供职。后来，侯仁之找到了一个地方——天津工商学院，那是法国天主教的大学。汉奸和日本人再



来问，侯仁之就以新工作做挡箭牌。这期间，侯仁之写完了《北京金水河考》和《天津聚落的起源》。

抗战胜利后，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1946年，他被派往利物浦大学留学。一到利物浦，中国留英学生会马上找到了侯仁之。中国留英学生会原来是国民党系的学生控制的，侯仁之到之前，留学生中的共产党刚刚“夺权”。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是剑桥大学的曹日昌，他是中国共产党员，一年后，因为要回国，大家推举侯仁之做主席，一向谦恭的侯仁之以不熟悉情况为由，做了副主席。

利物浦的住宿很贵。侯仁之是利物浦大学唯一住在学生宿舍的中国留学生。那是郊外的一区很漂亮的楼房，那里成了留英中国学生开年会的地方。

英国三年学业结束，新中国成立了。侯仁之异常兴奋，他是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忙着动员大家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英国的中共组织已经为侯仁之安排好了行程，临走之前交给侯仁之一封信，让他坐船先到香港。

在香港九龙，按照信封地址，侯仁之在一个院子的大门前的停了下来。大铁门关着，开着小方洞。“找谁？”侯仁

之把信递了进去，里面的负责人热情接待了他。这里是新华社驻香港的机构，他们安排侯仁之坐船到了天津，转往北京。

1949年9月29日，燕京大学西门外，张玮瑛带着两个孩子来接侯仁之。女儿馥兴尚能认出爸爸，儿子方兴躲到妈妈身后去了。方兴是1946年8月4日生，第二天，侯仁之就去了英国。三年间，张玮瑛每次给侯仁之去信，要四个星期才能到英国，国内通货膨胀，邮票常常贴满了信封。新生活终于开始了。侯仁之来到北京三天正赶上开国大典，他和夏仁德教授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庆典游行。当晚安排他在燕京大学贝公楼礼堂给全校学生做报告讲他自己当天的热情感受。“一个大灯照着我，气氛很热烈，永远难忘啊。”侯仁之说。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鼓舞着侯仁之，他思考着自己的学科如何为新中国建设服务。50年代，他参加了梁思成的北京市规划小组，60年代，他参加了六省区治沙会议后，把研究伸向沙漠。

其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部分学科并入北京大学，北京



大学迁到燕园，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

正当侯仁之的学术一片坦途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批“三家村”，侯仁之被卷了进去，背负了“三家村干将”的罪名，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鲤鱼洲在鄱阳湖畔，是北大的五七干校。

自1969年夏天开始，58岁的侯仁之接受了两年的劳动改造。在鲤鱼洲，筑堤坝抗洪，挑砖头、背水泥盖房子，插秧、育秧，打场、割稻子，他样样都干。连队各班举行割稻子比赛，割完了才能吃饭。有一次，在烈日下割稻子，侯仁之晕倒了。年轻人先走了，没人管他。之后，侯仁之醒过来了，回到住地，别人已经吃过饭午休了。

在鲤鱼洲，身体上的折磨可以承受，精神上的折磨却是更痛苦的。侯仁之是被监视的，所有的政治生活都被排斥的。每次晚上在宿舍开政治生活会，他就得独自在外面徘徊。有时天下雨了，侯仁之就扒开稻草堆，讨个容身之洞，在里面躲雨。等看到小屋灯影晃动，散会了，他才能回来。

对待往事，侯仁之是豁达的。他后来说，被迫到鄱阳湖劳动并不一定是坏事，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身心更加坚强

了。去鲤鱼洲时，侯仁之带了个扁担过去，返京的时候，他又带了回来。他打趣地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可是，那个年代，纵有妙手，又怎能著文章。1971年夏回来后，侯仁之继续劳动。

一天，他像往日一样，到草场去拔草。上面来人通知他说，回去吧，别干了。他以为那是在考验他。回到家，侯仁之开始把文革前积累的沙漠资料重新整理，开始写作。1972年，全国恢复了部分学科如文物考古等专业的学术研究，侯仁之又迎来了一个学术的春天。

“文革”后期，侯仁之恢复了工作，应邀展开了对邯郸、承德、淄博等城市的历史地理考察和写作。1978年科学大会后，他重返西北沙区考察。1980年，获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回忆起这段，侯仁之说：“八十年代，真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好时期，历史地理专业开始发展成长，后学渐长，又多次赴国外交流讲学，同时开始对比研究中外城市的历史地理，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一集、二集相继出版，快慰之情，溢于言表……”

二 行走天下



侯仁之对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推崇备至，“情有独钟”。虽然他为这份情付出了代价——《徐霞客》这本小册子，被人别有用心地利用，让他蒙受了批斗、劳改之苦。侯仁之敬慕徐霞客一生把全部精力放在自然探索上，从而为自然地理学开辟出一个新方向的这份痴情，也许，他更羡慕徐霞客那种天地任我驰骋的侠气。千古文人侠客梦，更何况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大自然就是他的工作室。

1993年春，82岁的侯仁之召集历史地理教研室开会，全体教员去辽西，那里，他和弟子发现了重大课题。从地学楼出发时，天降大雨。火车在暮色中蹒跚，行至半夜，路遇塌方，无奈折回西直门。侯仁之的最后一次野外考察就这样无情地结束了。

60年的野外考察生涯，是他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于希贤教授在谈到自己的导师时说：“侯先生是学历史出身的，但他的眼光一直是看向窗外的，告诉我们要到自然当中去，念活书。念活书要经世致用。他强调，念书就是要为了国家的富强，在经济建设时期就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不是个人写几本书扬名。”

60年代，侯仁之把目光投向了沙漠。这缘起于1958年的那次会议。

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大地质地理系的系主任，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会后，他犹豫了，自己要不要直接参加这项工作？毕竟在沙漠中进行历史地理学的考察，在中国前无古人，他也没有经验。但最后他还是接受了这一全新的挑战。

从1960年开始，侯仁之利用假期，带领北大地质地理系的部分师生进入西北半干旱地区，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蚀状况进行调查。

初进沙漠地区，侯仁之就忘我地投入进去。中科院研究员、当年的北大地质地理系三年级学生李宝田回忆说：

“学生都是定点的，按划片完成任务。每次都是侯先生只身进入河东沙漠选点，他沿着长城沿线跑，经常迷路。一次，我们到一个县城考察，侯先生为了考察现场，进入了一个沟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可以爬上来的地方。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从表面放眼看，一片平坦，而下面却沟壁陡峭，纵横相连。他在沟里摸索了很久，终于看见了远方有一丝



亮光，奔过去，才走出沟，正好有一个我们的学生住在那里。要不然，奔波了一天的侯先生恐怕无处可住了。”

一个多月的考察转眼即逝，要返京了。在去银川赶火车的途中，侯仁之险些遭遇车祸。车在黑夜中行驶时，撞进了沟里，司机被撞晕了。侯仁之坐在前排，半天才醒过来，发现插在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全折了。

70年代末，当侯仁之回忆这次考察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他学术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终于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开始进入了荒无人烟的沙漠”。这一个多月不同寻常，侯仁之发现了大量历史时期人类活动遗迹，他触目惊心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同时，他也开辟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回来后，他写出了专题研究论文——《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河东沙区的变迁》。

1962年底，侯仁之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考察计划：从1963年到1972年，完成从内蒙西部经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但是计划在1966年被无情的中断了。

1963年，侯仁之约请了北大考古系的俞伟超、地理系的李宝田（后调入中

科院）来到了乌兰布和沙漠。当时的背景是国家要建包钢，这样一个大的工业基地，需要解决粮食和蔬菜的供应问题，于是准备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搞粮食蔬菜基地。在那里发现了很多古墓，周总理指出，既然古人在这里生活过，为什么他们退出了呢？如果我们再进去，是不是也会被赶出来呢？

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他们看到了汉代的废墟、汉代的烽燧，还有数以千计的汉代墓葬群。强烈的风蚀作用，掠走了古墓的封土，墓室顶券裸露地表，修砌成排的墓砖，历历可数。接着，他们发现了三个古城，经考证是汉代的临戎、三封、麻浑。这里曾是屯边抵抗匈奴的汉代垦区，当时是一片沃野，汉武帝时大量中原居民迁居于此。抚古思今，侯仁之感慨万千，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投入到细致的研究之中。后来，他与应邀同去的考古学会俞伟超合作写了《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两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和当地政府的重视。

1964年8月，侯仁之又和有关人员一道，来到了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



考察了沙漠东南隅红柳河畔的两座古城废墟——统万城和城川城。

统万城，当地人叫它“白城子”，因为城是用白土筑成。这个 1600 年前显赫一时的大夏故都，正沉寂在浩瀚的沙漠之中。《北史》上记载：“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城五仞，其坚可以斫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饰以丹青，穷极文采。”可谓盛极一时，而今，侯仁之只能在飞沙烈日中膜拜遗风了。千年的侵蚀，城墙失去了棱角，但它依然倔强地屹立着，似回想着那段不复存在的历史：公元 413 年，叱咤风云的匈奴领袖赫连勃勃看中了这块水草丰美的宝地，决意筑城，创建大夏国，此后这里曾是何等的喧闹。

侯仁之环绕城墙，徘徊在旧河滩，在史籍和旧迹中寻找答案，凡是文献所及，他必加引证。他对沙漠的起源，流沙的移动，古湖泊的消失，跨越时空，仔细探寻，还借助碳 14 测定，进行孢粉分析。他已经站在了沙漠历史地理考古的前沿。就此，他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有关当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沙漠历史地理”的开创，可以说是侯仁之试图把从五六十年代浓厚沿革地理传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引向科学的历史地理方向的一次努力。在侯仁之的带领下，西北地区历史环境变迁研究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北大也建立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研究也为营造三北防护林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采访时，侯仁之说：“我们地理系的一位年轻副教授邓辉今年去了统万城，现在那里种了树，绿了，可惜我不能去了。”

40 多年过去了，回想起与侯仁之一起考察的日子，李宝田说，沙漠考察危险无处不在。一次，通过红柳河时，汽车过不了，侯仁之牵着毛驴过河。河表层干了，下面是沼泽。侯仁之指挥大家分散开，保持距离，说一旦发现自己的地方软了，赶快躺倒，就这样颤颤巍巍过了红柳河。还有一次，在乌兰布和沙漠，他们遭遇了沙尘暴，飞沙遮天蔽日，突然又下起了冰雹，侯仁之让每个人在沙丘掏洞藏身，才躲过一劫。事后知道，那场冰雹给当地人造成了伤亡。

“文革”让侯仁之中断了沙漠研究，“文革”后期，有了行动的自由，侯仁之又走出了京城，应邀走向河北、



山东，把他的“城市历史地理”理论应用到百废待兴的城市建设之中。

1974年到邯郸，1975年到承德，1976年到淄博，三年间侯仁之应当地政府的邀请考察、研究了三个城市，为地方的城市规划提供参考。他分别写了《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承德市城市发展的特点和它的改造》《淄博市主要城镇的起源和发展》。1978年，他又到了芜湖市参加城市规划工作。

生活中的侯仁之奉行谦和之风，但在城市规划时，虽是请来的客人，他却从不“客随主变”，是非问题上从不退让。

城市规划重要的是要首先给一个城市确定性质。承德是历史文化名城，但70年代还没认定历史文化城市。在做城市规划时，侯仁之坚持把承德定为社会主义风景旅游城市。历史上因帝王避暑产生了这个城市，从以后的发展看，这个地方还是风景园林区。但承德市领导不同意，那个年代是不搞旅游的，认为搞工业城市才对。当时的国家建委却是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当时在文化革命的气氛下，能从历史文化和当地客观条件出发，来定这个性质是不容

易的，侯先生还是坚持真理的，坚持科学的。”当时一起去的谢凝高教授后来说。

在芜湖，侯仁之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这次侯仁之是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请去的。万里请了侯仁之去芜湖做城市规划，清华大学去做黄山风景区规划。

芜湖是沿江城市，芜湖市旁边有三座小丘陵，小丘陵有不少历史文化的遗存。当时铁路的规划是要将小山丘铲平，把一个大的江南编组站放在这里。侯仁之建议把这个编组站沿长江往下游挪位置，这样，既保护了历史，又有利芜湖的发展，也给城市留下了园林绿地、城郊风景区。但是铁路部门规划得早，如果要挪，除了科学的论证，还有繁琐的手续。侯先生坚持主张向下游移，经过几次讨论，一直上报到国家建委，经建委和铁道部协商，加上万里的支持，方案最后通过了。后来芜湖的发展证明，侯仁之是对的。

侯仁之认为：“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上，对一个城市的起源、城址的演变、城市职能及城市面貌的形成和发展，都应该看作是研究范围内的事。”因此，他从对北京、承德的研究，探讨城市面

貌的形成和特征,从对芜湖的研究探讨城市位置的转移及其规律,从对淄博的研究探讨地区开发和城市兴衰的地理因素,既丰富了中国历史是地理研究的研究范围,同时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应用到指导城市规划和发展的事业中。

三 为师之道



多少年来,侯仁之总是向人提起他的恩师洪业,是洪业把他引向了历史地理学。

1938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侯仁之接到洪业的电话,说让他过去。侯仁之感到很奇怪,洪业平时都在下午或周末接待人,怎么上午让他过去?刚刚开学会有什么事儿呢?来到燕南园54号,洪业书房开着门。洪业从不在书房接待人,总是在客厅。这一次洪业在书房中,听到了侯仁之的脚步声,让他进来。侯仁之一进来,洪业就送给他两句话:“选

择学校不如选择老师,投师要投名师。”侯仁之听罢一头雾水。洪业接着说:“哈佛大学是名校,没有地理系,我看你兴趣已从历史转向地理了,就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去,利物浦大学远不如哈佛大学有名,但利物浦大学的地理系有非常好的教授。”当时,洪业向哈佛大学输送了几位燕京大学的学生。侯仁之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后,听了顾颉刚开的《古迹古物调查》,渐渐对地理产生了兴趣。洪业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已经为他选好了导师去利物浦大学进修的道路。

侯仁之永远忘不了这个上午,虽然这次行程由于次年二战的爆发推迟了7年。最后在燕大毕业时,系主任顾颉刚把侯仁之留在了身边,毕业后两年,洪业给他指明了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侯仁之说,这两位授业恩师是在燕京大学期间和以后的学术道路上对他影响最大的人。

国学深厚的顾颉刚最初把他带向了野外考察,西学背景浑厚的洪业指导他如何做研究,也许,两位恩师于无声处影响侯仁之的更是他们对人才的爱惜和一双发现人才的慧眼,因为,侯仁之的学生们都感受到了。



1977年12月的一天，昆明师范学院的教师于希贤出差来北京，慕名拜会侯仁之不遇，就把一篇关于滇池历史地理论文放在侯仁之家里。侯仁之读过文章后，约他周日上午再去侯家面谈。于希贤如期而至。侯仁之和于希贤谈起了徐霞客和李贽的联系，谈起了地理学的分科问题，四五个小时不知不觉间过去了，于希贤临走时，侯先生叫住了他：“你有没有愿望到北大来进修？”于是，于希贤留下了自己的地址。

于希贤回到昆明，妻子来接他时，惊喜地告诉他：“北京的调令来了，调你去北大工作。”后来，由于昆明师范学院不放人，于希贤不得不通过考研究生的方式来到了侯仁之身边。

回忆起此事，于希贤说：“为了学术的发展，侯先生不遗余力地破格调我来，这是对后学多大的提携和鼓励啊。后来我才知道，侯先生当时还没被‘解放’，北大党委书记周林找到侯先生，说老专家、老教授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找助手，侯先生就提出调我来做助手。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侯先生为人大丈夫的气魄，对年轻学子不计亲疏，为人师表啊。”

侯仁之的博士生邓辉，也曾有类似的经历。1985年，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大三学生的邓辉，给侯仁之写了一封信，信中附上了一篇文章关于楼兰的小论文。“那篇论文现在看来很幼稚啦，”邓辉说，“信寄出两周后的一天，一位北大学生来找我，说是受侯先生的委托来送信的。我接过来一看，是侯先生的亲笔信，还有送来侯先生的书《历史地理理论与实践》，书的扉页上用英文写了鼓励的话，签名日期是1985年4月17日。侯先生当时是学部委员，非常忙，这封信是在开会时写的。信中还列出了一些书目让我看。”在工作两年后，邓辉也考入了历史地理的硕士研究生。

邓辉说，作为学术带头人，侯仁之爱才如命，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愿意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他都一视同仁地关爱。对已毕业的学生他也不忘关照。对此，谢凝高早有认识，他说：“我们1955级的班上有个同学黄发程，是广东人，成绩很好，对历史地理研究很有兴趣。毕业分到内蒙古。1977年，黄发程的爱人生小孩时，侯先生给他家里寄去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有小孩子穿



的衣服，帽子，袜子，还有香皂等日用品……当时内蒙生活比较艰苦。”

侯仁之的学生、1978 级的硕士尹钧科，毕业后因家事到了山东教书。稍后，北京市社科院成立了地方志研究小组，急需人才。侯先生得知后，极力推荐了尹钧科，一个星期尹钧科就调了过来。尹钧科的同学都开玩笑地说：“尹钧科‘一夜之间，鸡犬升天。’”“侯先生不善于拉关系，他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尹钧科是把好手，爱才啊。”邓辉说。尹钧科从作学生时起就是侯仁之的好助手，直到今天。不久前，尹钧科编辑出版了《侯仁之讲北京》一书。

侯仁之治学方法或治学之道，他的每个弟子都能滔滔不绝地谈上半天，但不用多说，看到“侯仁之”三个字，大家也能想象到或感受到。但侯先生的处世之风和性情只有他的弟子体会更深。

邓辉会说，侯先生很平易近人。

唐晓峰会说，侯先生很有豪情，且内心很细腻。

1990 年夏，侯仁之带队从承德到围场县考察，途中在隆化转车。因为是过路车，他们买的车票没有座位号。邓辉心想，说什么也要给侯先生抢个座位。火车进站后刚停稳，他就纵身一跃，往

窗口里钻。侯先生看到了，怕他掉下来，赶紧上来从后面托一把，邓辉进去了，列车员一把把侯仁之抓住了。列车员说侯仁之是协谋，立刻没收车票。任凭侯仁之在车厢里怎么说，列车员就是扣住票不给。直到随队教师、侯仁之文革前的硕士生王北辰上来给列车员又鞠躬又赔不是，还不忘说：“这是我的老师、政协委员、大学教授。”列车员才放行。后来侯仁之见到邓辉，还夸赞他“很有闯劲。”侯仁之和大家一样自己拎包，坐硬座，和学生同住一个房间，吃一样的饭。当时侯仁之 79 岁。

1978 年夏，侯仁之在芜湖做城市规划，他通知他初入学的三个研究生——于希贤、唐晓峰、尹钧科直接到芜湖报到，先参加实践。每到一地，侯仁之满怀新奇地考察当地遗址。做城市规划的间隙，他带着弟子到长江的支流青弋江上游寻找鸠兹古城遗址，这是一座从春秋一直延续到宋代的古城。果然找到了线索，侯先生很高兴。回来时下小雨，他们找小船顺流而下，细雨朦胧，一路侯先生谈笑风生。下了船，侯先生买来白酒，一曰驱寒，二曰庆祝确定城址成功。初次见面，三个弟子就体会到了导师的豪情。

回到北大，侯仁之的第一课，不是在教室，而是带他们去圆明园遗址作实地考察。从山岗到湖泊水系，侯仁之一路讲来。中午 12 点时，他们来到了林中空地，侯仁之说：“我们就在这午餐。”三个研究生面面相觑：吃什么东西呀。抬头一看，侯仁之的儿子方兴正骑着三轮车赶过来，说话间，把全套的野餐所需运到：面包、香肠、黄瓜。三人感叹导师之细腻，把讲历史、考察遗址和郊外野餐合而为一，巧妙安排了。

85 岁的时候，侯仁之用“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来自励。三年前，侯仁之出版了一本自选集，名为《晚晴集》，取“平生最爱夕阳晚，坐听涛声到黄昏”之意。王毓菡现在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还协助进行一些必要的工作。他说，侯先生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写作，整理文章、书籍，还关注网上信息，乐观而平和。

四 侯仁之的北京城



写下这个小标题，是缘于侯仁之对北京城倾注的感情，这个城市他居住了几十年，他研究这个城市；还因为侯仁之对北京城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建设性的、成就卓著的，在学术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同时，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集中体现了侯仁之的学术思想。

侯仁之从青年时第一次看见北京城时，就感到了难以抗拒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吸引力。1984 年，侯仁之在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en）所著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文译本的序言中，对当年初识北京城有这样一段回忆：

“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对当时被称作文化古城的北平，心怀向往，终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乘火车到达了前门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前门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那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藏在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直到北平解放了，这座历



史古城终于焕发了青春，于是埋藏在我心田中并已开始发芽的这粒种子，也就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迅速发育成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殿堂。”

侯仁之对北京城的研究始自燕京大学。那时，顾颉刚教授创设的一门新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这极大激发了侯仁之的兴趣。侯仁之就读的是历史系，但是受到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他对这门走向野外的课程，情有独钟。他担任了顾颉刚的助手，从此，他把地理考察和北京地区的研究结合了起来。

当时，侯仁之在读到梁启超《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一书中关于顾炎武生平、学术时，他不禁泪下。顾炎武为了反抗清朝的政治需要，用两头骡驮着相关的书籍，沿途访问当地父老，考察了华夏大地。北京也留下了顾炎武的足迹，他写成了《昌平山水记》和《营平二州地名记》两本书。侯仁之沿着顾炎武的足迹，踏遍了北京的原野，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地理考察素材，他还将一部分北京名胜古迹文献材料分

门别类，编辑成《故都胜迹辑略》。

作了顾颉刚的助手后，侯仁之经常利用周末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作准备。一个星期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走，墙走完了，继续沿着墙的大体方向前进，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个槽可能过去是通过这里引水的水槽。这水到底流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进一步考察发现，水流到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研究元代郭守敬从昌平引水，经过西山进入北京城提供了线索，也为他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这只是年轻时候仁之考察北京古迹的一个小故事。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只是传统的沿革地理，虽然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创办的《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名称使用了“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这个名词，但是内容却仍然是沿革地理的。侯仁之此后的一些论文如《北平金水河考》《天津聚落之起源》整体上也没跳出沿革地理学的圈子，但是他在尝试，



试图将文献考证与野外的实地考察结合起来。

1946 年是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临行前，他带上了大量的北京历史地理的资料，侯仁之说，他要“带上这些砖头瓦块，去学习建筑方法，构建历史地理的大厦。”后来，侯仁之又把这批“砖头瓦块”带了回来，如今还摆放在他的家中，竖放起来有一米多高，其中有《光绪顺天府志》《日下旧文考》《畿辅通志》等。

侯仁之就学于罗士培(Percy Maude Roxby)教授任职的利物浦，罗士培是英国第一个地理系——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他也研究中国地理。侯仁之去英国后一个月，罗士培到中国来访问，不幸在上海去世。侯仁之说，他当时很痛苦，还写了悼念文章。这时，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系主任、剑桥大学地理学专业毕业的达比(H. C. Darby)，成了侯仁之的导师。

达比是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也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英国历史地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他对历史地理学的解释简单而明晰，认为：“历史地理学的材

料是历史的，而研究方法是地理的，任务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他还认为，研究地理景观必须要有发生学的思想：首先，现代地理景观仅仅是现在很薄的一个时间层内，而且也正在变成历史地理；其次，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达比 1931 年在剑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英国历史上沼泽地的作用》，是开英国地理景观变化研究之先河的著作。

达比还相继担任过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教授，英国地理学家学会主席，长期研究英国区域历史地理，著有《中世纪沼泽地》《1800 年以前的英国历史地理》和《英国历史地理新编》等著作。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的影响很大。侯仁之说：“看达比怎么研究英国历史地理，对我启发很大。他总是从自然条件、河湖水系、交通条件等开始研究某地的历史地理，例如从伦敦河道、伦敦桥等研究伦敦，对我完成博士论文《北京的历史地理》，很有启迪。”1984 年达比曾来中国，侯仁之陪他参观北京，他邀请侯仁之去他此时担任系主任的剑桥大学地理系访问。此时距离他们 1949 年的分别已经 35 年了。



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经过在英国的三年学习，侯仁之在学术认识上完成了一个质的变化。摆在侯仁之面前的任务就是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写道：

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关系的方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我以为假如我们要真正了解北京这个大都市的发展，必须先问下列几个问题：（1）北京最初的聚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2）这个聚落最初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时候才开始获得了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3）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如何逐步得到发展以至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4）在成为全国的行

政中心之后，它的政治首都的机能又如何得到发展？这都是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但其中没有一个是传统的以政治区划演变为主的“沿革地理”的研究所能答复的。

侯仁之的这篇文章很短，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被建立起来了。因此，唐晓峰认为：“侯仁之是旗帜鲜明地、系统地倡导新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中国人。”

侯仁之也是按照他上述的思路开始重新研究北京城的，同时他还参加到北京城的规划之中。1950年，侯仁之应梁思成之邀，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为北京城市发展研究提供研究参考。于是，侯仁之写就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为海淀区的规划提供了依据。这篇文章中，侯仁之从地理环境这个新颖的角度，从海淀周围的“海淀台地”和“巴沟底地”两个地形特点入手，巧妙地结合了当地水系的分布特点，揭示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过程的特点。研究侯仁之历史地理“环境变迁”思想的邓辉教授认为，这是中国



历史地理学界第一篇严格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范例，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北京城是如何起源的，原始城址在哪里？侯仁之研究认为，三千多年前永定河上的古渡口，相当于卢沟桥所在的地方，是古代太行山东路南北交通的要冲之地，这里的交通枢纽地位具备了形成城市的条件，但是由于易遭受洪水威胁，使得北京城原始城址出现在蓟丘，即今天的莲花池附近。几十年来，侯仁之作了大量关于北京历史地理的报告，他总是从永定河古渡口、蓟丘讲起，他的研究也从这里展开。从蓟丘，到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再到明清京城，直到现在的新北京，侯仁之做了系统的研究，写出了《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海淀镇与北京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渊源》等论文。侯仁之的研究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确立，他从河湖水系、交通区位等地理特点入手，结合文献考证、实地调查，

吸收了考古学、建筑学的理论与方法，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布局和城址迁移的全过程，这是侯仁之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创新。

几十年来，侯仁之对北京城的研究，对北京城规划和建设的影响是很难用准确的量化来评估的，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说明他和他的研究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学科方法，一座古老的城市，一项前无古人、启示后学的学术成果。

侯仁之还主编了《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和第二集。1988年第一集出版时，谭其骧教授盛赞：“深感研订之精确，编制之得体，印刷之精美，皆属上上乘，诚足为历史地图之表率。”“此册之出版，不仅对研究北京之历史地理有重大价值，还可为全国编制省级历史地图之楷模也。”

由于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成绩，1999年10月侯仁之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同年11月获美国地理学会(AGS)颁发的乔治·戴维斯勋章。该勋章主要授予在太平洋及其大陆边缘地区研究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侯仁之是全世界获得此项荣誉的第六位科学家。2001年10月美国国家地



理协会 (NGS) 又授予 2001 年度“研究与探析委员会主席奖”以表彰他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特别是野外考察和探析方面的突出贡献。

在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过程中，侯仁之的学术思想也日趋成熟。1962 年，侯仁之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内容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必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

这里，侯仁之格外重视“地理环境”的研究，特别强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80 年代末，侯仁之发表了《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一文，可以说是他几十年关于北京地区环境变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时，侯仁之已经把环境变迁的思想，推广到他所从事的整个历史地理学实践中。他还提出，应该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限上溯到全新世的早期，即原始农业萌芽的时候。1992 年，侯仁之发表了《再论历

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了环境变迁思想。他提出，北大历史地理学应该选择北京市地表水主要来源的密云水库上游地区的潮河流域和邻近的滦河流域（即所谓的“潮滦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开展地表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重点地区。在侯仁之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北大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师生，在河北承德开展了研究，进而东扩到内蒙赤峰地区。本文前面提到的侯仁之最后一次出行未果就是为了这次考察赤峰地区，为申报课题作准备。后来，中心师生完成“全新世以来冀辽蒙接壤及毗邻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这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这项研究是侯仁之对“环境变迁”思想的实践。

多年来，侯仁之还曾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团有关城市发展战略组的顾问和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他关注着这个八百多年的古都如何规划和建设，关心文物、古迹的保护。这里有很多侯仁之保护北京遗迹的故事，保护莲花池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莲花池位于蓟城西侧，是最初的北京城的水源和起点。后来金在北京建中都，成为北京建都之始，莲花



池就是北京城市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遗址和见证。北京西客站最初选址在莲花池，当时的莲花池已经干枯，多年淤积的结果使之地势低平，便于进行地下建筑，也没有搬迁问题。但是，侯仁之不愿看到莲花池的消失，他写报告指出：

“莲花池的保护非常重要，金中都的建设与它有直接关系！”于是规划设计方案接受了侯仁之的意见，在莲花池东北岸上建起了西客站。随后，又建议把玉渊潭的水引入莲花池，恢复历史上的自然风光，为名城增色。如今，莲花池在“新京门”——西客站旁重现秀色神韵，给整个城市留住了记忆，美化了市容。

“必须把后门桥保护下来，元大都的大运河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侯仁之的又一个建议改变了后门桥濒临破坏的境地。后门桥是历史上北京城址转移的一个标尺。忽必烈占领金中都时，战争毁坏了城市。在另建新城时，城市设计者刘秉忠要把忽必烈的居住地琼华岛（今北海白塔山）和附近水域（今天的北海、中海，后来又开挖南海）包容在城市之中，于是他在北海、中海上游的积水潭（今天的什刹海）东侧确定了新城的中轴线的起点，就是今天后门桥

所在的地方。这里是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起点。侯仁之说，保护中轴线是保护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建议把什刹海的水引过后门桥，恢复后门桥下这段河道的水上景观，使历史上的中轴线最初设计的起点焕然一新。

2000年12月21日，莲花池和后门桥遗址举行修复仪式时，侯先生坐着轮椅前去参加，北京市市委书记贾庆林握着侯仁之手说：“我是冲着您老人家专程来的。”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侯仁之对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的贡献。1984年，侯仁之在华盛顿做《北京—华盛顿在规划设计上的比较研究》时，从美国一些教授那里获悉中国可以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回国后，在1985年4月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他约了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等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加入该公约，并获批准。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八达岭长城、故宫等处最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前，我国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已经超过30处。这其中侯仁之的贡献可能已不为人所知了。



在北京一些地方都可以看到侯仁之撰写的碑文，如《明北京城城墙遗迹维修记》《白浮泉遗址整修记》《北京建城记》等。

2003年，北京城建都850周年，侯仁之又应邀写了《北京建都记》。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不仅因为侯仁之在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地位，更是因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侯仁之一直在不断地用真情默默地书写着他的北京城。

（作者汤继强，原文标题为“首届蔡元

培奖之二：历史地理学的巨擘——记环境学院侯仁之院士”）

（侯仁之于2013年10月22日辞世，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12月23日）

编辑：碧荷

责编：山石

来源：北京大学主页

【百廿英才】儒雅学者 真醇人生

——记北大中文系袁行霈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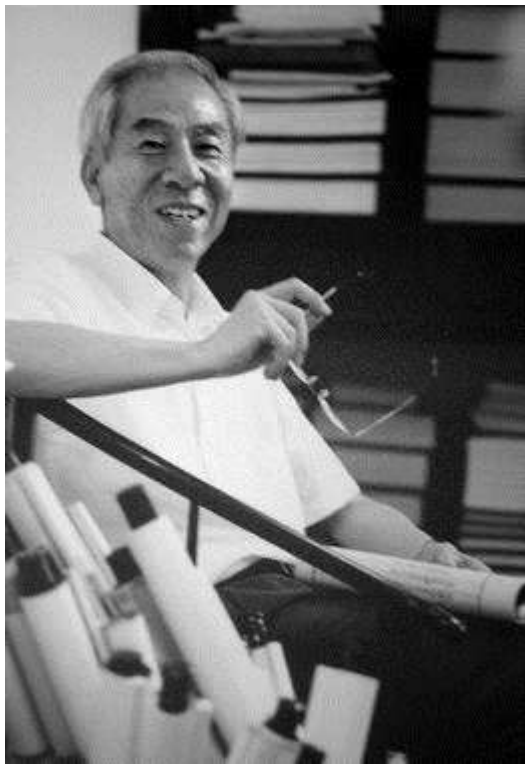
编者按：鸿儒荟萃，领思想之潮；群英云集，开风气之先。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120年来聚集了众多的著名学者专家、学术大师，涌现出大批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些杰出人物，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谱写了北大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值此百廿校庆之际，新闻网特推出“百廿英才”专题，和读者一起感受这些杰出人物的学识魅力、人格魅力、精

神魅力。本网首先推出的是，党委宣传部于2006年采写的首届“蔡元培奖”获奖者专访。

你是他的学生，上课之前你期盼着他的到来。他轻轻地推门进来，白发皤然，精神矍铄。他微笑着和你打招呼，询问你的学习、生活状况，你的每一丝忧虑或欢乐都可以和他分担或分享。一堂课下来，你有许多感想要对他诉说，他会耐心地听，同时启发你得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结论。

他，就是已经在北大生活了半个世纪的长者，中文系的袁行霈先生。



袁行霈

一个没有传奇性的人

在我们的眼里，先生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他不会让你感到局促和紧张。他认为两个人之间——哪怕是晚辈和长辈，也应该平等地对话。他从来都是那样心平气和，那样波澜不惊。在先生面前你会以为这种气象的背后一定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我不是一个传奇性人物，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先生淡淡地说。但是平实并非平庸，先生踏实质朴的经历如泉流山涧，没有惊涛骇浪，却于涓

涓前行中别有一种潇洒的气韵和韧性的追求。

在他的老同学作家马嘶的印象中，先生首先是以勤奋好学、聪慧多思、成绩优秀和思维敏捷为同学注目的。那时，同学经常发现他在未名湖畔的绿树丛中捧书诵读，或掩卷沉思。先生还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他经常写诗，并以音质优美的朗诵受到大家欢迎。马嘶先生说：“袁行霈没有年轻人通常具有的心猿意马、轻佻浮躁、好高骛远那等凌厉之气，也从无生活懒散、读书不求甚解的郎当作风。他从不张扬夸耀、显示自己的长处，也从不干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事。他于朴实无华的为人处世之中，时时洋溢着一种蓬勃向上、昂扬进取的朝气，表现出一个有志有为青年的高洁品质。”

1957年，他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58年秋先是带着学生到北京城子煤矿半工半读，每周三天下矿井挖煤三天上课，持续了两个多月。接着又到密云钢铁公社劳动了大半年，烧过锅炉，做过炉前工、木工、铸工。1959年夏他又下放到斋堂公社白虎头大队劳动，直到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在这段时间里，他以青春的热情投入新的劳动生活，至今还想念着那些和他一起劳



动的矿工和农民，想念着那漫山遍野的桃花和梯田上一层层绿油油的谷苗，他曾两次回斋堂看望老乡们。然而，让他痛苦的时刻还是来临了。在1962年以后那段狠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先生被定为全校的“白专”典型。文革开始后，很自然地受到批判，下放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多，在一次翻车事故中，从波阳湖大堤上摔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在那种压抑的氛围中，先生感到动辄得咎，无所适从，“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时候”。

袁先生说：“我的好运是从40岁开始的”，那是1976年。最令他难忘的是1979年，那一年，他连续发表了《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等三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他在中文系率先讲授了专题研究课“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他提升为讲师，搬进蔚秀园的两居室。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安定了，他的教学和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那门课讲得还算成功。”先生陷入对往昔的回味中，脸上的那种愉悦只有一个在内心深处和

学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才有。他准确地记着一些学生的名字，那时的学生岁数普遍比现在的大，他们在文革期间耽误了很多年，一旦考进北大，便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当先生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水泄不通，走廊、窗户外面都站着听讲的人。此后几年间，先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先后讲授过中国文学史基础课，以及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专题研究课。先生的课在80、90年代成为中文系学子和许多喜欢中文的学子心中的经典课程，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北大学者风度的象征，成为北大学子心中美丽的记忆。一位博士说：袁先生上课的时候，那种陶醉和潇洒，让你感到他还是个年轻人。

也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学者风范开始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1982—1983年，先生应邀赴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一年，他是首位受聘于东京大学的北大教授。时间刚刚过半，东大中文系主任就给北大发来公函，称赞先生“学识渊博，人格高尚”，并希望先生延长一年。1992—1993年间，先生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又引起了巨大反响。先生回国时，许多学生自发到机场送行，有的学生家离机场太远，就在



头一天晚上赶到距机场近的同学家里落脚。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在显著的位置对先生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和热情洋溢的赞美，文章的题目更散发着浓郁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京城来了人》。直到现在，每当遇见新加坡学界的的朋友，他们还会津津有味地谈起先生当年的风采。

先生上课很有自己的风格。他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课堂上总是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国学研究院 2002 级的博士生曹胜高说：

“袁行霈老师很有雅量，尽管他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学者，但是他非常虚心，非常坦然地倾听同学的不同见解。”只要是袁先生的学生，或听过袁先生课的人，你只要问及他们的感受，他们首先想到的词多半是“如沐春风”。“上袁先生的课你经常有这样的体验，不知怎么，咦，一节课就过去了。”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袁先生对学生不严格要求。国学研究院每一届学生开学典礼时袁先生都要在讲话中提到：这里的学生要提交两篇论文，一篇是学术的论文，一篇是个人品德的“论文”。他要求学生做到学问和道德的统一。

先生对学生交的论文，大至谋篇布局，小至遣词用字和句逗，都不放过。

2003 年非典肆虐期间，一个博士生正在写学位论文，但是又不能像往常一样跟老师面对面地交谈。于是先生就利用电子邮件进行指导和批改，等到论文定稿，电子邮件已经积累了一大堆，最紧张的时候，先生一天改了三次，发了三遍，以至于最后大家都说，出一本论文的批注版都绰绰有余。先生上课的板书俊秀飘逸，每当他转身写字时，那气度，那字迹，总是要激起一阵感叹。他习惯竖写，一行行地从右到左，一节课下来，黑板上就完成了一篇书法作品。他的学生中也有不少擅长书法的，于是一个误传不胫而走：要考先生的研究生首先得书法好。前两年先生还收到考生的一封信，询问此事。

由于教学和研究成绩斐然，1979 年先生在做了 22 年助教后成为讲师，第二年即 1980 年升为副教授，1984 年国家教委组织全国部分老教授审核后特批为教授，1986 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先生微笑着说：“我大概是做助教时间最长的人，”应该再加一句，大概也是做讲师时间最短的人。由于在教学工作中的突出贡献，1989 年先生获得全国高等



学校首届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个人);1991年获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1993年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公众推选的十佳教师);1995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他担任了多项社会职务时还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亲自指导的研究生有些已成为国内外相当著名的教授,或担任着一些部门的领导工作。他常说:“我的本职工作是教书。”先生对教学相长的古训深有体会,他说,好的学生固然和老师的培养分不开,能成为好的老师也跟学生分不开。先生深深眷恋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苦心孤诣的学术之道

先生走上学术道路和他从小所受的文化熏陶有很大关系。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培养了他对古典文学的爱好,启迪了他对文学的慧心和妙赏。

1953年,先生考进北京大学,从此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1957年毕业,被林庚先生留做助教。在1960年至1964年的几年间,他和陈贻焮先生一起跟随他们的导师林庚先生主编了《魏晋南北

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还参加了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的选注工作。做这些工作需要阅读大量的作品和史料,为他今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7年他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出版,此后在日本又出版了此书上编的日文译本,在韩国出版了全书的韩文译本。此书于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学界对于这一专著的认可令先生感到欣慰,然而谈及这本书的时候,先生屡屡提及的却是林庚先生所作的序言,其中显示了两代学者心灵的脉脉相通,特别是他对导师的感恩之情。林庚先生在序言中说:“人之会心,或囊括宇宙,或隐于针锋,灵犀脉脉,若相问答。行需为学多方,长于分析,每触类而旁通,遂游刃于群艺,尝倡边缘之学;举凡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维所至,莫不成其论诗之注脚。本书上编盖由浅入深,沿波以探源;下编则青山历历,峰峦自见。仿佛两条坐标轴构成一幅坐标图,交辉映照,互为表里。话固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譬喻又总是跛足的,不知其可耶非耶。多年来



行霏时叩我柴扉，每纵谈终日，乐而忘返；盖习以为常，亦性之所近也。”

随着学问的精进和学术成就的积累，先生对做学问的见解愈加高屋建瓴。他认为做学问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明白；另一种是对简单的事情，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先生认为，学问也和诗歌一样具有气象。

“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弘，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而形成这种气象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敬业的态度，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第二是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长，不攻人短，不存门户之见；第三是清高的品德，潜心学问，坚持真理，堂堂正正。先生说，具有大家气象的学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他们的学问都具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垂范后学；他们都是学问和道德并重，用正直、诚实、刚强成其宽容、独立之气象。

1995年，教育部请袁先生主编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他约请了19所高校的29位学者，营造了良好的

学术气氛，大家团结一致，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完成了全部书稿，共四卷。他不但将这部书定位为教材，也定位为学术著作，因为好的教材都应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并有独到的见解。他为这部书花费了大量心血，从组织班子、草拟编写要点、确定全书体例、拟定编写工作条例、统改编写大纲，直到全书初稿完成后对全书进行统改润饰定稿，以及看校样，他总是事必躬亲。他还亲自撰写了总叙论、第三卷叙论，以及第三卷的两章。他利用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的机会统改书稿，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夜以继日辛苦了将近四个月。他手提着一箱子书稿，从中国到美国，又从美国返回中国。他说自己从不做挂名主编，这部书就是证明。

关于这套教材的编写方针，先生提出“守正出新”四个字，先生还确立了撰写文学史的三条原则：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这与先生关于诗歌艺术研究经验的总结（博采、精鉴、深味、妙悟）同样有其个人特点，即强调会通化成。傅璇琮先生认为该书“打破传统概念，开拓研究视野，展示了学术发展的新方向”；杨义先生认为全书的总绪论和各编的绪论，“从文化学的大视



野考察了文学与政治社会、宗教信仰、学术思潮、传媒和受众等诸因素的联系，荦荦大端，层次分明，有些地方写得非常大器”。该书在 1999 年 8 月出版，2000 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1 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 年又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被许多高校采用。这是对他们这个集体的高度肯定。

无论就人生追求还是学术兴趣而言，先生生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部分是他对陶渊明的挚爱。他对陶渊明的研究从 80 年代初就开始了，前后持续了 20 多年。2003 年他出版了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项目、厚达 900 页的《陶渊明集笺注》。书中内容包括校勘、题解、编年、笺注、考辨、析义，并附有和陶诗十种、陶渊明年谱简编等。为了整理此书，先生广泛调查研究了国内外《陶渊明集》的各种善本，选择汲古阁藏宋刊十卷本为底本。这是各种善本中最好的，也是现有各种注本从未用过的孤本。所用五种校本都是宋元刻本，并参校各种总集、类书、史书。其中所校陶集异文多达七百多处，校记中一一注明，并对多处重要异文作了考辨。读

者可以从书中看到底本以及其他各种宋元刻本的面貌。先生此书兼采各家之说，其中多有散见于各种书籍、报刊而从未被人注意者，也包括海外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对各家之说必详加考辨，择善而从，且断以己意。先生此书既带有汇校和集注的性质，又有很强的独创性，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可谓一种新的尝试。先生认为，陶渊明的作品看似平易，实则含义深邃。对于此书的笺注，先生在字词、典故、史实的解释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而又不满足于此，对许多含义深刻而被人忽略的地方，必旁征博引，加以阐释。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多有自己的说明，对一些史实也不放过。

先生曾在东京大学、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系统地讲授过“陶渊明研究”课程，并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就陶渊明作过专题演讲。所发表的多篇论文，在 1997 年汇集为《陶渊明研究》一书出版。这些研究成果都吸收到《陶渊明集笺注》一书中，使此书不同于普及性的注本，而具有学术性。书中所附和陶诗，对于深入研究陶渊明接受史有重要意义。有的和陶诗十分罕见，是根据手迹和孤本整理的。《陶渊明集笺注》在 2004 年获得北京市



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先生《论和陶诗的文化意蕴》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对北宋以后大量的和陶诗作了深入的阐释,并指出陶渊明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号。可以说和陶诗是先生所开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先生从小就喜欢陶渊明,在追求自然和朴实的生活中,他一方面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单纯和宁静,另外又向往和追求哲人的那种自省、自觉。他用两句诗总结自己对人生境界的追求:

“表里俱澄澈(张孝祥词句),心迹喜双清(杜甫诗句)。”先生说,对陶渊明的研究过程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愉快的过程。他曾经为陶渊明纪念馆撰写了一副楹联:“质而绮,真且醇,自可传之千古;樽中酒,篱下菊,岂甘了此一生。”显示出他们心灵的相通,也表达了对于前贤的理解和尊敬。夜深人静,喧嚣散尽,先生每每披衣静坐于他的书房中,与陶渊明衷心交契。很多人把先生看作是一个具有陶渊明风范的人,先生自然反对,但在他身上确实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的清高。

承传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感

先生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一是承传中华文化,二是沟通中外文化。在承传中华文化方面,既注意高深的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又注意向大众普及。

1992年初,北大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任命他为主任。中心章程规定:为了充分发挥北大文史哲考古等学科雄厚的学术实力,发掘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术事业的发展,经学校领导批准,成立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在袁先生的主持下,中心编辑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先生在发刊词中说:“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纳入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缓,或涨或落,变动不居。国学也是这样,汉有汉学,宋有宋学,今后则必有以今之时代命名的学派。历史悠久的国学只有不断以新的形态代替旧的形态,才能永葆青春。”“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国学,必将抖落身上的尘埃,吸取各国优秀文化的营养,以其扶疏的枝叶向全世界展现旺盛的生命力。”

先生站在中国学术承传的高度,站在振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站在古今和东西融通的高度,审视中国文化



的前途，其新锐精到和宏放激切让人兴奋。至今，《国学研究》已经编辑出版了17卷，成为国内外很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中心还组织并资助了30多项研究课题，已出版十多部高水平的研究著作，编辑为《国学研究丛刊》。中心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摄制《中华文明之光》150集，每集三十分钟，一百多位北大老师参加讲解。根据《中华文明之光》改编的少儿读本《中华文明大视野》2003年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提出来特别讲一讲：一是《中华文明之光》播出后，各界人士好评如潮。九十多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亲自打电话赞扬这套节目格调高雅，深入浅出。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则在贺信中指出：“你们利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把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把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去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这种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举国哀悼的那些日子里，《中华文明之光》曾是中央电视台每天连续多次播放的主要节目。二是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之际，中心主办了有17个国家的著名学者参加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和很有深度的交

流。袁先生在会上作了开幕辞，题为《文化的馈赠》，响亮地提出一个处理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关系的主张。馈赠的关系是双向的，既把自己的好东西馈赠给别人，也乐意接受别人的馈赠。馈赠的态度不是彼此对抗而是彼此尊重，馈赠的结果是多种文化互相交融、共同繁荣。提倡“文化的馈赠”，意在通过互相交融，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化的高度昌盛。“馈赠”的主张得到广泛的注意，这次会议也被誉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

2001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改名为国学研究院，袁先生又出任院长。在袁先生和他的同事的共同努力下，2002年国学研究院招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博士班，目前已招收了五届学生，第一、二届已经毕业，取得博士学位。有的博士一毕业就被一所重点大学聘为副教授。国学研究院还组织北大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院系的36位教授和副教授，共同撰写多学科交融的学术著作《中华文明史》。袁先生把这项工作当成承传中华文明的一件大事来抓，他和其他主编亲自参加撰稿，大家齐心协力，经过六年多的认真钻研、反复讨论、多次修改，今年四月《中华文明史》终于出



版。全书共分为四卷，约 160 万字，400 幅插图。初版印了一万一千册，一个月后就加印了七千册。

14 年来，这个虚体性的研究机构出版的各类著作约两千万字，为学术研究特别是跨学科研究做出了贡献，为学者们施展才能搭起了舞台。

为学术繁荣献策

先生现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这些职务中的任何一个职务都足以让人敬慕，但先生说：“我只把这些看作是我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袁先生的头衔和职位，没有一个是他自己主动谋求的。1992 年 3 月，先生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天，经别人提醒，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全国政协常委里有自己的名字，才知道自己今后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了。1996 年他被民盟的前辈领导人提名，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2003 年，先生又被河北省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接着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先生来说，法律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先生为了很好地履行一个代表的职责，除了参加各种会议之外，还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对提交常委会讨论的法律草案，

先生像做学问那样认真推敲，提出意见和建议。

常怀感激之心

在采访中我始终都怀着一个问题，由于担心会不会触及先生的创痛而没有发问，但最终还是问了：“先生既然在这个地方曾经遭受过不白之怨，为何还是一往深情，并且老而弥笃？”“我的气质和学问都是北大给的，没有北大就没有我的一切成绩，为北大做贡献是应该的。再说，比较起来我还是十分幸运，真没有什么委屈。”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甚至觉得这都不应该成为问题。

袁先生说自己“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这并不是过分的谦虚，而是他的真情流露。他说：“我能做出一点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大家的帮助和成全。本应做得更好，但没有做到，留下许多缺陷。”常怀感激之心，表明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周围人的善意。常存惭愧之意，是一种可贵的反省精神，表明一个人智性的健康和完整。惟其通过反省，不断看到生命中尚需充实的空间，生命才具有不断走向充实的可能。



我急切地想知道袁先生在学生期间都受了哪些人的影响和鼓励，他告诉我：亲自教过他的老师就有：杨晦、游国恩、浦江清、吴组缃、林庚、冯钟芸、魏建功、王力、袁家骅、高名凯、周祖谟、林焘、曹靖华、季羨林、金克木、李赋宁、周一良、邓广铭等。林庚先生是他多年追随的导师，林庚先生是以诗人和学者双重身份而受到尊敬的大师。如前所述，林先生在给袁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自然地流露了他对这位弟子的赞赏，他们师生之间不仅有着学术上的师承、深厚的师生情谊，还有着朋友似的默契。难怪袁先生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版中将他和林先生的合影放在正文之前，也难怪在袁先生书架的一个明显位置上，摆放着袁先生和林先生的合影，林先生清癯而坚毅，袁先生充满敬意和幸福。袁先生每逢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国学研究院这 14 年来的工作成绩时，总是

由衷地感谢跟他密切合作过的一百多位老师，感谢副院长兼秘书长吴同瑞和秘书处的其他老师们。他说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有限，只不过能够体谅人、团结人而已。的确，跟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觉得心情愉快。

先生写过一篇散文《我心中的北大》，在文中说：“北大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气象，有一个不可测其深浅的底蕴，唯有大海才能比拟。”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大海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智慧，获得了宽容，获得了勇敢。惟其如此，面对人生的各种考验，先生才显得那样雍容。（本文最初发表于 2006 年 12 月 15 日，作者杨晓华，原标题为“首届蔡元培奖之九：儒雅学者 真醇人生——记北大中文系袁行霈教授”）

编辑：知秋

责编：山石

来源：北大新闻网

■ 学者谈读书

书趣 | 袁行霈

到我识字的时候家里藏书已经不多了，父母督责又不严，所以我小时候并没有认真地读什么书，当然也领略不到书的乐趣。只是因为没有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父母又不肯放我出去“撒野”，便只好取书为伴，胡乱地读来解闷。在读过的书里真正喜欢的也不多，只有一部《聊斋志异》成了我的好朋友。我本耽于幻想，但任凭我想入非非，也幻化不出聊斋那么多瑰奇的故事。我对蒲家庄那位老秀才佩服极了。至于外国文学的知识，多半是靠了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大纲》，这书印刷精美，又有许多插图，成了我经常摩挲翻阅的读物。陆放翁说他小时候偶然见到陶渊明的诗，欣然会心，爱不释手。日暮，家人喊他用饭，至夜卒不就食。那真是一种福气。我远未达到他这样痴迷的程度。

1953年我考入北大，经常钻图书馆，这才日益体验了书趣。当时的图书馆在办公楼南侧，负责出纳的馆员，论年纪有的是师辈，和蔼可亲，颇有书卷气。

递上索书条，略等片刻，书已到手。书库在楼上，有一类似烟囱的通道通到一楼的出纳台，借还的书籍都是由这通道吊下吊上的。等书的时候，那吊索、吊索上的书笼和书笼里放置的各种各样的书刊，便成为我注视欣赏的对象。那时阅览室里还有两样东西使我感兴趣，一是开架的工具书，有的厚极了，两手托不住，平摊在一个固定的支架上，任读者随时翻阅；另一样是铅笔刀，似乎是固定在一扇不开的门的框上，铅笔插进去，用手摇几下就行了。这些小设施体现了管理人员对读者的一份细心的关照。那时的馆长是向达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懂得读书人想亲近书的心情，所以允许教师入库。我一毕业留校任助教，便享受了这种优待，于是常常登上楼梯，钻进书库，随意浏览。身子挤在高大的书架之间的小“胡同”里，前后左右除了书还是书。伴着淡淡的书香，一呆就是半天，比看电影、逛公园还惬意。有时被好奇心驱使，专取那些



尘封已久的书来翻，弄得两手都是灰。看书的同时，留意书后借阅者的签名和年月也挺有意思。有一部书从三十年代郭绍虞先生借阅以后从未有人借过。郭先生的签名十分隽秀，至今难忘。进库的规定“文化大革命”中取消了，八十年代初得以恢复。有一段时间我的体力不佳，偶尔带个小马扎进去，站累了可以坐下歇歇。小马扎允许带入书库，是管理人员的优待和信任，心里很感激。

入库省了我很多精力和时间。有些书本来只要查阅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麻烦管理员为我们取出来，彼此都省事。有时为了研究一个题目，要查阅许多书，入库就更方便了。更重要的是入库可以激发做学问的兴趣，在无意的浏览中还可以发现新的有意义的研究课题。1982年至1983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教书，课余曾到八家著名的图书馆访书，有时也获准入库。著名的静嘉堂文库是收藏原属我国南宋楼藏书的一家图书馆。馆长亲自陪我入库，不少国内已看不到的宋元善本，整齐地存放在樟木制做的书柜里，欢迎读者借阅。更使我感叹的是东京大学的汉籍中心，索性发给我一把书库的钥匙，供我随时入库读书，真是方便极了。

逛书店也是一件趣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都有不少旧书店，书多而且便宜，偶尔还能碰上善本。可惜当学生时零用钱很少，当了助教月薪也不过五六十块，能有多少钱买书呢？实际上是把书店当成图书馆来逛。近几年收入增加了，可是书价也涨了。线装的古旧书，以前几十元一部的，现在恨不得卖到千元，仍然是买不起。隆福寺的旧书店关闭了，东安市场的旧书店消逝了，只剩下琉璃厂还有几家，俨乎其然的，早已不是当年那副欢迎读书人来买的样子。物以稀为贵嘛，也难怪。不过平心而论，这些年我还是买了点书。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走进书店万不得已不要空手出来，总得买一两本才对得起书店和书的作者们。就这样，有自己买的，有朋友写了书赠送的，加起来我这间14平方米的书房几乎摆满了三面墙的书。陶渊明有诗曰：“我土日已广，桑麻日已长。”我看着自己的藏书常常想起这两句诗来，借用其意以表示藏书增长的喜悦。

不过，做研究还得靠图书馆，个人的书远远不够。一些老师不愿离开北大，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恋这儿的藏书。尽管别处住房宽敞奖金优厚，但是



书少，做研究不方便。我希望政府多拨些图书经费，使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更丰富些，也希望北大图书馆多做些方便读者的事。读者的研究工作取得成绩，决不会忘记图书馆里那些忙忙碌碌供给他们图书资料的人们。

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编著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山海经初探》等。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作者简介：袁行霈（1936-），生于山东济南，原籍江苏武进。1957年毕业于北

书缘 | 侯仁之

读书人爱书，自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我的记忆中，由于读书爱书而结下的人间情谊，更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因缘，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因以“书缘”为题，写下这篇小记。

教我爱书的，首先是我的母亲。还记得在我初入小学时，母亲就要我爱惜自己的书本，每册书本，一定要包好书皮，并且不得在书本上乱写乱画。这就开始培养了我爱书的习惯。但是从爱书又为我引发了在人生道路上一种坎坷情谊的，却是从我在初中一年级时偶尔阅读了冰心的《超人》开始的。从这本富有写实意味的新文学创作集中，我获得了自己心灵上一种未曾有过的感受。我曾把它比做“一泓清流注入了我儿时生

命的小溪”，又好像是“一阵清风吹开了我少年时期的心扉”。从此我开始热衷于当时所谓新文学书刊的涉猎，并且养成了课外阅读的习惯。高中三年我虽然选读了“理科”，却仍然保持着对新文学读物的爱好。完全出乎意外的是这点爱好，对我投考大学又是十分有利的。当时（1932）我所在的潞河中学，可以保送学习成绩达到一定标准的毕业生，参加燕京大学的特别入学考试，只考中文和英文两门。我参加投考的那一次，是要到燕大校内去应试的。这次的英文试题，我已毫无印象。可是国文试题，我却终生难忘。我清楚记得前来考场命题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女老师。她只要求写作“白话文”和“文言文”各一篇，



并随手把白话文的题目“雪夜”和文言文的题目“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写在黑板上。稍等了一会，不见有问题，她就走了，另有人前来监考。事后我才知道，这次亲来命题的，正是《超人》的作者冰心。而我自己对这两个题目，也颇觉得得心应手。结果也就比较顺利地录取了，并且获得了入学的奖学金。因此我就一直心许冰心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了。现在冰心师已是93岁高龄，我自己也已年逾古稀，而我对冰心师的情谊，自觉有增无已。特别是读了她近年的写作如“我请求”诸文之后，更是如此。最近北大附小的小同学们，在辅导员的组织领导下，有计划地阅读了冰心师的《再寄小读者》之后，纷纷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学校经过精选，要印一本专集，却委托我去面请冰心师题写书名。我欣然前往。冰心师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还立即取出最近刚出版的《冰心近作选》（舒乙、周明明编）送给我，然后郑重地对我说：“那么，你给起个书名吧。”我兴之所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就叫做《我的小读者》不好么？”事后冰心师还是经过进一步的考虑，终于用墨笔写下了《小读者的回响》这个书名。我看了之后十分高兴，

因为含义更加明确。同时我也殷切期待着今天的“小读者”中将会有新一代的作家学者成长起来。

当初我自己升学到燕大之后，以书为缘的人际遇，真是一言难尽。但是在学业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洪煜莲师。实际上还是在他的课堂教学之外，他的一部并非主要的著作，却对我产生了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影响，这就是他的《勺园图录考》。按“勺园”原是晚明大书法家米万钟所亲自设计的郊居别墅，并亲自绘有《勺园修禊图》画卷，流传人间。二十年代初，燕大新辟校园于海淀，勺园故址适在其中。其后又以重价购得《勺园修禊图》。煜莲师遂将该画卷及其作者的有关文献资料，搜集殆尽，然后分类考订，汇集成册，连同复制的《勺园修禊图》，刊行问世（1933年）。当时正是由于这部书的启迪，我对整个校园的开发过程及其水道源流发生了兴趣。以此为起点，我又进一步对北京西郊园林的兴建与河湖水道的变迁，陆陆续续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到了抗日战争初期，更扩大到有关北京城内水道演变的探讨。结果终于写成了一篇《北平金水河考》，并以此就教于煜莲师。没想到他竟写给我如下的一段话：



“《北平金水河考》已匆匆读过一遍，得见创获累累，胸中为之一快。一年有半以来此为第一次见猎心喜也。中间有尚宜斟酌者若干点，得暇当细为签出，下次相见时，可就而讨论之。”应该说这正是“以书为缘”凝结而成的一种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是我所永远不能忘怀的。现在煨莲师谢世已十余年，他的遗书中由我珍藏的一种，正是这部《勺园图录考》。

事有凑巧，当我正在考虑起草这篇短文时，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为创刊中的《国学研究》征稿于我，并以“跋《勺园修禊图》”命题，我不能辞，虽然我所能写下的，也很难超出《勺园图录考》的范围。

最后，我不能不讲到“以书为缘”，在异国的同好中，也同样是可以结交为良朋好友的。且举最近的一例于下。

1984年春，也就是中美两国首都缔结为友好城市的时候，我正应邀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进行北京与华盛顿在城市规划上的比较研究。该系瑞溥思（John Reps）教授是研究华盛顿城市建设的专家，承他以所著《杰出的华盛顿——首都中心部分的规划设计及其发展》（1967）一书见赠，以此

为主要参考，我得以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的专题研究。此后不久，我所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立即寄他一部。他十分高兴，不仅予以高度评价，而且他还和夫人共同手举这部图集，拍了一幅照片寄给我。这就不仅是学术上的交流，而是已经深化为一种“情谊”上的表示了。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去年4月写信告诉我说，他的一部新著《华盛顿的展视——1970年以来的首都》，将于10月出版，只因这部书太大，将由海运寄我。他先期来信告诉我，因为这部大书写明是献给我和他的一位研究莫斯科城市建设的好友、莫斯科建筑学院阿茨涅戈尔（Sergey Oznegor）教授的。我再三阅读了这封来信之后，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因为这无异是通过瑞溥思教授这部新著，又进一步把三个各自热爱自己首都的异邦学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去年8月我出访荷兰和美国，经过预先联系，也就顺便于11月中再访康奈尔大学。又恰逢阿茨涅戈尔教授前来驻校讲学，于是在一个简短的仪式上，我们共同接受了瑞溥思教授的这部新著。书内正文开始前的一整页上，排行整齐



地印着：

给我的朋友和同事
在北京和在莫斯科的
侯仁之和阿茨涅戈尔

这不正是“以书为缘”而缔结的一
种极为难得的人间情谊么！

作者简介：侯仁之（1911-2013），山东恩县人。著名学者、历史地理学家。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学英国，获哲学博士学位和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和地理系主任。著有《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上的北京城》和《步芳集》等。

来源：新浪网读书频道

■ 好文共赏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同志们：

今天，有机会同大家一起座谈，感到非常高兴。再过两天，就是五四青年节，也是北大建校 120 周年校庆日。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北大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向全国各族青年，向全国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近年来，北大继承光荣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成果丰硕，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成绩突出，学校发展思路清晰，办学实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令人欣慰。

五四运动源于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激励着北大师生同人民一起开拓、同祖国一起奋进。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北大师生应该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

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我国发展的战略安排，这就是：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广大青年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我说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广大青年要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我记得，1981 年北大学子在燕园一起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今天我们仍然要叫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广大青



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同学们、老师们！

近代以来我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我们的今天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的明天需要青年人接着奋斗下去，一代接着一代不断前进。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但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和

效益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借此机会，我想就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同各位同学和老师交流一下看法。

我先给一个明确答案，就是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前不久，我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向全体代表讲过：“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我讲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种伟大精神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创造和积淀出来的，也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使命。大学对青年成长成才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



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此，有3项基础性工作要抓好。

第一，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礼记·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今中外，关于教育和办学，思想流派繁多，理论观点各异，但在教育必须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说具体了，就是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所以，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世界人民心目中马克思至今依然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要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化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

和科学真理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认识，教育他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发展走向，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让学生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为学生成长成才打下科学思想基础。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只要我们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效，我们的大学就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话语权。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办学就要尊重这个规律，否则就办不好学。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



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

第二，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一大批各方面各领域的优秀人才。这对我们教师队伍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样，随着信息化不断发展，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教和学关系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也对教师队伍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要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考虑大学师资队伍的高素质要求、人员构成、培训体系等。高素质教师队伍是由一个一个好老师组成的，也是由一个一个好老师带出来的。2014年教师节时我同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代表座谈时就如何做一名好老师提出了4点要求，即：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我今天再强调一下。

古人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在学生眼里，老师是“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一言一行都给学生以极大影响。

教师思想政治状况具有很强的示范性。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让教师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师德师风建设应该是每一所学校常抓不懈的工作，既要有严格制度规定，也要有日常教育督导。我们的教师队伍师德师风总体是好的，绝大多数老师都敬重学问、关爱学生、严于律己、为人师表，受到学生尊敬和爱戴。同时，也要看到教师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出现的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认真解决。要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第三，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既要有高尚品德，又要有真才实学。学生在大学里学什么、能学到什么、学得怎么样，同大学人才培养体系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大学硬件条件都有很大改善，有的学校的硬件同世界一流大学比没有太大差别了，关键是要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立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

问题来建设，可以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但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而贯通其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是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我们的特色和优势有效转化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能力。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大学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攻关创新。要下大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和强有力的科技攻关团队，加强学科之间协同创新，加强对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的支持。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力争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

同学们、老师们！

当代青年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我们面临的新时代，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代。广大青年既拥有广阔发展空间，也承载着伟大时代使命。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我衷心希望每一个青年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对广大青年来说，这是最大的人生际遇，也是最大的人生考验。

2014年我来北大同师生代表座谈时对广大青年提出了具有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这4点要求。借此机会，我再给广大青年提几点希望。

一是要爱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我们常讲，做人要有气节、要有人格。气节也好，人格也好，爱国是第一位的。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要时时想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



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二是要励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王守仁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可见，立志对一个人的一生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广大青年要培养奋斗精神，做到理想坚定，信念执着，不怕困难，勇于开拓，顽强拼搏，永不气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1939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我们人生难得的际遇。每个青年都应该珍惜这个伟大时代，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三是要求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知识是每个人成才的基石，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学习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不能满足于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要通过学习知识，掌握事物发展规

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有在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中才能充分发掘出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希望广大青年珍惜大好学习时光，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更好为国争光、为民造福。

四是要力行，知行合一，做实干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正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每一项事业，不论大小，都是靠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出来的。“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是永恒的道理。做人做事，最怕的就是只说不做，眼高手低。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要面向实际、深入实践，实践出真知；都要严谨务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苦干实干。广大青年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在新时代干出一番事业。我在长期工作中最深切的体会就是：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同学们、老师们！



辛弃疾在一首词中写道：“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我说过：“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新时代青年要乘新时代春风，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以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的奋斗中梦想成真！

2018年5月2日

编辑：山石

来源：北大新闻网

史苑钩沉

校长蒋梦麟：带领北大走出艰难（下）

关于平民教育

平民主义教育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脉。蒋梦麟强烈反对封建牧民教育和德、日等国的强权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平民主义教育。1919年1月，蒋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和平与教育》一文，指出中国和平的基础一向建立于不牢靠的牧民政治上，提出平民教育的概念：“牧民政治之反面，即平民主义是也（或曰民权主义）。平民主义，首以增进平民之能力知识为本，使人民咸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于是一方以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而为和平之保障；一方以个人之才智，社会之能力，而扫除强暴不良之政治。”

蒋梦麟这样阐明平民主义教育的概念：“曰自治也，独立也，自由平等也，发展个性，养成健全之个人也，皆所以增进个人之价值，而使平民主义发达而无疆也。”他认为，20世纪应该是平民主义的时代。在《今后世界教育之趋势》中，蒋梦麟指出：“然以趋势而言，平

民主义之发达，足以杀军国主义之势焰。此吾教育界所当注意者也”。“国家之进步，人类之幸福，赖教育平均之发展”。“总之今后世界教育之趋势，以发达人权为归。而国中发达人权之教育，当求其平均与普遍”。

蒋梦麟主持《新教育》月刊之始，发表了平民主义的创刊宣言——“以教育为方法，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创造进化的社会，使国人能发达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机会。俾平民主义在亚东放奇光异彩，永远照耀世界而无疆”。

1918年，教育部成立教育调查会。首次会议上，蒋梦麟和沈恩浮提交了“教育宗旨研究案”，提出新教育宗旨在于“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所谓共和精神者”是指（1）发挥平民主义，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之本；（2）养成公民自治之习惯，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共和精神的内容根本就是“平民主义”，“创造进化社会”和“养成健



全人格”是平民主义教育的核心内涵和最终目标，蒋梦麟的这一教育思想在壬戌学制中得到体现。该学制所列七项教育标准，第一条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第二条是“发挥平民教育精神”，第三条是“谋个性之发展”，第六条是“使教育易于普及”。

蒋梦麟认为平民是社会的基础，社会进步不是少数知识阶级的人能够做到的，社会进步应从下层开始动，下层平民一旦不稳，上层就会站不住脚。中国的状况是，当国家发生变动时，“在四万万人民中，有三万九千万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其余一千万中，有固执不化的，有关了门不管闲事的，有若知若不知的，有一味盲从的。”在这种情况下，进步无疑是一种空谈。由此他提出必须实施平民教育，给那些没地方受教育、没钱受教育的平民子弟以接受教育的机会，启蒙他们、提高水平，进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蒋梦麟反复提倡的平民主义教育的本质内涵与他提出的“积极的个人主义”相一致。他认为要开展平民主义教育，必须尊重个人价值、发展个性，而发展个性则是通过学术、体育、美育和改良社会等种种健全的活动养成健全的个人

实现的。

关于职业教育

1917年蒋梦麟回国后，最先致力于职业教育活动。他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社部总书记，参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的拟定，担任《教育与职业》杂志主编，并随黄炎培于1918年6月赴东北三省调查职业教育情况。他主张职业与教育不可分割，应以教育来解决职业中存在的问题，职业教育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和家政多方面内容。当时的中国已开始兴起工业，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急需人才；而此时的实业教育远远满足不了这一需求，高等教育规模又很有限。以1916年教育数据统计为例，全国公立私立大学才10所，学生数仅3609人，专科学校76所，学生也不过15795人。能受高等教育的只是极少数人，蒋认为必须通过职业教育使多数青年能学得一技之长以为谋生。“以今日社会状况而论，受四年初等小学教育后，能入高等小学者，有几人乎？高等小学毕业后，能入中学者，有几人乎？中学毕业后，能入大学者，又有几人乎？”虽然，“由初小高小由中学而直达大学毕业之学生，其大多数固能养成高等专门之学，然其余之不能下级而上达者”如果顺其自然，那



学校无疑是“徒为社会养成高等之游民耳，抑何贵乎教育？”故必须设法对这些学生进行补救，“职业教育其奚由耶？”他主张分设不同类别的教育，要“施设职业教育、补习教育加增经济之能率”，学校“注重职业陶冶以养成生计之观念”，要达到“养成工业社会之领袖”和“工业社会之良匠”的目的。

关于教育与政治

对于教育与政治，他认为不应完全脱离，但应采取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态度。“但管教育，不谈政治”。关于政治，一是政党与政事，教育界不应当涉足与干涉，因为这类政治是经常变动的。二是政论，这关系政治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应当辨明是非，主张正义，开展启蒙，养成民主政治之习惯。这是教育责无旁贷的天职。因此，教育绝不是培养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但是，从历史的长河上看，政党、政事之类的政治，终究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的历史陈迹，而学术、文化，才有恒久的价值。他认为青年学生不应过多介入现实政治，他们的目标是先将自己培养、造就成有知识、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为国家所用，国家危难时，可以满腔热情去关注国家大事、唤醒民众，但不应忘自身将来之职责，荒

废学业。现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成年人应该冲锋在前，担负起救亡图存的国家重任。

三、蒋梦麟的教育实践与担当

蒋梦麟的教育实践可谓丰富多彩。他曾长期留学美国，专攻教育学，对西方教育思想有精深系统的研究；回国后又长期担任大学校长和政府教育部门领导职务，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蒋梦麟对于促进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教育实践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积极参与新教育改革时期。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到参与几本教育杂志的编务，再到担任主编，蒋梦麟一直在努力介绍欧美教育思想与制度，提倡平民主义。这几份刊物后来成为教育改革的主要阵地，确立了蒋作为教育理论家的地位。

二是主持北京大学时期，这是他践行教育理想的重要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受托代理北大校长事务而加盟北大，到1945年10月因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秘书长而去职，其间蒋断续服务北大共二十余年。自1930年冬蒋梦麟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北大校政十七年，是历届北大校长中任职时间



最长的。在北大任职期间，他与胡适、陈独秀等通力合作，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追求真理”落实为治校的共同准则。

教授治校、民主治校是蒋梦麟办大学的一个重要主张。来北大后，特别是“五四”以后，他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一步改革，不断完善、充实民主治校的领导体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了学校的管理工作，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使“五四”以后的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大学的楷模。他对于“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身体力行，并支持胡适提出的课程选修制，让学生成为修习的主导，能够自主选修课程，领一时大学风气之先。根据教授治校原则，北大于1920年正式创设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部四大部门，分别负责学校立法、行政管理、教学安排和学术，以及庶务和图书管理。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评议会为北大首创，使得教授治校以组织形式落实，委员由教授推选，教务长、总务长及各学院院长为当然委员，校长为评议长。举凡学校制度，需经评议会议通过。评议会有权决定学校各项规程，授予学位，维护风纪。校长仅一人，下设总务长、

教务长，再是各院院长。这一改革促使北大真正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保证大学真正成为不受政治干扰、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构，可以无畏地追求真理。

1930年，蒋梦麟正式接任北大校长。到校视事后，蒋提出《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北大职志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据此重建文、理、法三学院，实行学院制，各设院长一名，由校长从教授中聘任；改原来评议会议为校务会议，职权相同，必要时延聘专家列席，实际为教授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仍保留；推行学分制，要求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正规化；同时广纳贤才，选聘优秀师资，充实队伍。他对文学院院长胡适、理学院院长周炳琳、法学院院长刘树杞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这种大胆革新的精神，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积聚了一批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教授。

20世纪初的中国，军阀混战、教育经费奇缺，大学受到严重戕害。北大也是经费枯竭，教师收入下降，学校规章尽废，图书散失，学术团体溃散，前景堪忧。蔡元培1923年6月辞职，代校长



蒋梦麟避害逃离，胡适等名教授出走，名宿星散。蒋梦麟正式接任后，积极为教师们创造学术研究条件，改善办学条件；努力恢复和建立学术团体，推进对外学术交流；加强学生管理，鼓励学生自治。蒋梦麟将蔡元培提出的“教授治校”方针发展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为保证教授专心教学科研，他实行教授专任制，并设研究教授，提高专职教授的薪酬待遇，在外校兼职的教授，薪水会少于专任教授。专任教授年薪 4800-6000 元，研究教授最高年薪可达 9000 元，后傅斯年提出过高，研究教授年薪才降为 7200 元。这种收入足以保证教授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30 年代北平四口之家一个月 12 元伙食费，全部开支只需 30 元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历史学家顾颉刚当时于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授，月薪 320 元，北大请他时，答应给他每个月 450 元。为保证办学需求，蒋梦麟多方活动，为北大争取到每年 20 万元的固定经费，加上自筹经费，保证了基本的办学需求。蒋梦麟用人不拘一格，对教授礼遇有加，北大之尊师重教风气，由此绵绵不绝。

而正是他这种敢于担当、冲锋在前的精神，使得他被日本军方列入了要逮

捕的黑名单。1935 年日本阴谋策划华北事变，策动汉奸们成立“华北自治会”。蒋得知后，率先联合北平各界发表宣言抨击这一卖国行径，激发全国反响，掀起北大学生反日高潮，引起日方恐慌。

11 月 29 日，他被日本宪兵挟持，只身来到东交民巷日本驻军司令部。面对日军要绑架其到大连的威胁，蒋梦麟大义凛然，义正词严，以“郭子仪第二、单骑回纥”的精神怒斥日军，使得敌人悻悻而退，这一壮举被广为传颂，得到学界高度评价：“这男子汉的气度，非胡适、鲁迅诸氏所能及”。

三是主持地方和中央教育行政时期。1928 年，蒋梦麟出任民国政府大学院长、教育部长，同时兼任浙江教育厅厅长、浙江大学校长。时间不长，多有建树。一是邀请陶行知为浙江办了一所培养农村师资的师范学校——湘湖师范。二是创办浙江大学，亲自选址。三是在出任教育部长期间，主持拟订和颁布《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

《大学规程》，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法制化。此外，他推广国语教学，重视外语教学，力主整顿私立学校，停止教会所办高校的宗教、神学系科。这些措施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正规化、制度化，



提升了水平。

四是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西南联大时期。1937年抗战爆发，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南迁，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任临时大学筹委会常委，共同主持校务，蒋任总务长，梅任教务长，张任建设长。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遭受轰炸。校方与政府接洽，决定再迁昆明，重组为西南联大。彼时彼境，办学困难可想而知。蒋梦麟以大局为重，勉力维持三校团结，想办法克服校舍、经费及师生生活诸般困难。北大是国立大学，经费原由政府拨给，南开大学为私立，经费原来靠自筹和捐助；清华以前由庚子赔款支付，抗战爆发后，后两者经费来源受到严重影响，而政府因抗战财政紧缩而大大减少了对北大的拨付。1941年11月，54名教授联名上书政府被拒绝，蒋梦麟积极联系费正清等外国友人，设法解决教师的待遇问题。曾任西南联大的教授叶公超回忆，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有人因为张、梅两位没有及时赶到主张散伙，被蒋严厉批评：“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办下

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都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除了坚定的爱国信念外，蒋、梅、张三人的谦谦君子风度，奠定了八年合作的基础。以学校的历史和执掌的资历，本应当以蒋为首，然蒋始终以团结为重，从不争名分。有后人评：“如果没有蒋先生那样‘善与人同’的胸怀，恐怕西南联大没有那么好的名誉。”在抗战期间，蒋梦麟仍然力主发展学术，培养人才。1939年秋，他促使北大文科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聘请傅斯年任研究所所长，至联大结束时，已培养出一批文史优秀人才，后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在繁重的行政事务外，蒋梦麟每天早上6点便起来复习英文，完成了其英文版的自传体著作《西潮》，该书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成为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部门的重要参考书。

蒋梦麟系统的教育思想和出众的管理才能，一直为孙中山、蒋介石、蔡元培所赞赏。然而由于他后期秉持“校长治校”理念，招致有人说他大权独揽。而西南联大时期他又以大局为重，在管理上多谦让清华与南开，与北大教授沟



通不畅，导致关系疏远，抗战胜利后在其欲出任中央政府秘书长时，北大发生了“倒蒋迎胡”风潮，蒋梦麟无奈中离开北大。

北大学者陈平原曾感叹：“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傅斯年评价蒋梦麟说，蒋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此看法蒋是认可的，他开玩笑回应说：“所以，他们两个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作为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把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投之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北大的建

设。他临危受命，把营造教育学术中心作为治理北大的理想目标，长期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维护北大的基本传统，在国家孱弱、屡遭战乱的艰难岁月里，铸就了北大和西南联大的几度辉煌，这些业绩不应被忘怀。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青史铭记，北大曾有这样一位校长。

（作者：周雪敏，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本文选自刊物《教育家》2016年第13期

责任编辑 陈宝泉

■ 大美北大

百廿校庆壁纸



燕园网讯
现代远程教育校园文化讯息摘编



燕园网讯
现代远程教育校园文化讯息摘编



燕园网讯

现代远程教育校园文化讯息摘编



摄影：蔡翔宇、曾亮、韩天祥、胡朝志、张根、张昕阳、韦维、谢昊

来源：北大新闻网

■ 学员心声

感恩母校汇总

愿北大薪火相传，燎原千秋

百廿周年校庆，圆梦共赋新声。
我们数千圆梦北大的莘莘学子，在为广东的建设和发展不懈地奋斗。虽然相隔千里，但北大广东校友会仍然通过马拉松、羽毛球赛等活动为北大高擎旌旗。峥嵘岁月，守正创新，圆梦北大的学员，怀着信念和情怀，走在广东建设的潮头，热血而豪情，为广东做贡献，也为北大争荣誉。感谢北京大学、感谢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感谢圆梦计划让我成为北大一员，有八天就是北大校庆日了，愿天下北大人，张开双臂迎接你们的喜悦与母校的辉煌。愿北大薪火相传，燎原千秋。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14级市场营销专业 张双辉

《燕园情》

——祝福母校120周年庆

未名湖畔思常在，
博雅塔前展风姿。
圆梦计划来助力，
去浮沉静贵坚持。
喜迎双甲庆华诞，
务实创新世代传。
兼容并包藏于心，
感恩奋斗励前行。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张燕



感恩母校

120年前的清末，战争四起、苟延残喘、民不聊生；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诞生了，他引领了百年中华民族觉醒自强的复兴之路。

120年后的今天，在这个国泰民安、欣欣向荣的新时代里，北京大学迎来了他一百二十岁的诞辰，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依然薪火传承、生生不息。而我，也很荣幸成为这一届的毕业生。

三年时光，白驹过隙，在北大网院的学习过程中，我努力过、奋斗过；徘徊过、迷茫过；喜悦过、也挫败过；但始终坚持不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

我是一名在香港的中文老师，虽然已经获得过很多学位，但是能够进入北大中文系一直都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感谢深圳校区的圆梦计划让我梦想成真。这三年的学习不仅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让我体会到持续进修的快乐；也带给了我更加扎实的语

文功底和思辨能力，让我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发挥得更出色；而我也将北大学习的精神传授给自己的学生，让更多的人了解北大，追求严谨治学、求实创新、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

回首在北大的这三年，感慨万千，受益匪浅。在北大迎来120年校庆之际，有太多的祝福与感谢想要送给母校——

感谢您，北大，是您给了我希望，让我能在心仪的学府扬帆起航；

感谢您，北大，是您赋予我力量，让我懂得矢志不渝、坚实信念与梦想；

感谢您，北大，是您教会我成长，人生路上，从此不再彷徨，锲而不舍，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

敬爱的北京大学，祝您生日快乐，我永远爱您！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15年秋季汉语言文学专业 王小颖



感恩北大

我是继续教育学院的一名学生，带着憧憬与向往与北大共度3载，还记得入学时老师教导“有教无类”，圆我儿时梦想，有幸遇到120周年校庆之际，送上我真挚祝福：

百廿时光一瞬间，

学术自由思路宽，

盛世更应多创新，

知识辉煌永流传。

祝母校生日快乐！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15级社会工作 张虹

百廿生日祝福

“燕园情，千千结，问少年心事，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一曲燕园尽情怀，作为继续教育的新生，愿能追随北大人的脚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家、为社会、为国尽绵薄之力！

在北大120周年来临之际，愿母校能承上启下、传承创新、永铸辉煌！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18级英语专业 陈艳



忆北大

校友桥头参味赏，青凫花蕾短篙撑。

未名湖畔偏钟磬，一塔湖图尽九楹。

韵刻华表留贝公，树栽银杏引经生。

红湖柳色今依在，德才均备别样情。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17 级毕业生肖飞

编辑：王凝、曾玉芬

来源：继续教育学院